

# 「鄧後中國大陸何去何從」研討會

會議時間：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

邵主任致詞：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國研中心舉辦這場研討會是因為鄧小平身體違和，各界揣測紛紛。因此本中心邀請中心內外的學者專家共同研討「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關於兩岸關係方面，我們的政策是以經貿為主軸，目前焦唐會談在經貿議題上商談似有進展。但是在經貿這條主軸之外，我們是否應輔之以文教交流，在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價值體系、資訊、新聞方面與大陸交流，不要只侷限於經貿，應擴大視野，成為兩岸關係另一主軸。最後我們要注意中共政權「治」與「亂」兩面的競賽。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民眾間產生了慾望上升的革命，而中共政權能否滿足這種衝擊，成為中國大陸「治」與「亂」的關鍵，我們應從「治」與「亂」兩方面全面深入探討中共政權「治」的本事與「亂」的力量，觀其競賽的結果。

\*

\*

\*

# 第一場討論會：政治變遷

引言人：張榮恭（中央通訊社副總編輯）

## 一、前　　言

一九九四年春節，中共第一代人物而以「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自居的鄧小平，以極其老邁的形象在上海出現時，引起了各方對其健康加速衰退的注意和重視。此後，關於他病危甚至死亡的傳聞不斷。今年一月十二日，紐約時報刊出鄧小平女鄧榕的談話，首度公開證實其父已不能自行站立和走路，這更加引起國際媒體對這個九十歲半的老人之健康情形的揣測（按：本文完稿後的一九九五年春節，鄧小平一改自一九八八年以來連續七年到上海過年的習慣，留在北京，中共「中央電視台」也沒有播放江澤民等高層人物向他賀年的影片，僅播報了文字稿，顯示這名老人受限於健康因素，既不宜再遠行，也不適再出現於電視上）。

在鄧的老化加劇之際，中共新一代領導班子也加速其全面宰制大局的進度。去年九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決定」宣稱，中共「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又說，「全會號召！全黨要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接著，李鵬於十月訪問南韓時表示：「現在中國已形成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十一月，江澤民訪問馬來西亞時說：「中共現已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今年一月，李鵬向到訪的北韓人士指出，「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十分重視與北韓的關係；其措辭突出第三代班子，有別於過去慣用的「中國」一詞，用心至為明顯。是月，朱鎔基訪問瑞士時又強調，中共已確立了以江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

可見中共對內對外都大力傳播新班子已繼鄧之後接掌大權，並且地位穩固。其目的無非是要強調一旦鄧小平去世，也不會影響「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掌權的態勢和既定的路線方針。不過鑒於毛澤東死後所立即爆發的四人幫被捕事件，以及毛的繼承人華國鋒被迫同意鄧小平復出，最終遭鄧剷除，並發生路線的大反覆，所以未來鄧去世後，中共可能的政治變遷仍是各方矚目的焦點。筆者試從中共當前的政治圖像，解析「鄧後」的可能變遷。

## 二一、兩個派系

鄧小平欽定的「江核心」，目前掌握並運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旗幟，承襲了鄧所樹立的改革派形象。儘管第三代領導集體所涵蓋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其間的觀點尤其關於經濟改革方面或有分歧，例如李鵬常被認為比較保守，不過和黨內左派相較，這個班子基本上都屬於改革陣營，也就是當權派。他們在「鄧後」應會基於危機意識，尋求以聯合陣線方式維持權位和穩住大局，從而使鄧所提倡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得以持續。

這個當權派應會獲得城市一般民眾、多數知識分子、工商階層和部分農民的支持；甚至激進的改革分子在無力另樹旗幟的形勢下，也不得不依附於當權派。而其核心江澤民的治國能力雖然存疑，但他在處理與元老們的關係及與「國務院」總理的關係上，都比其前任的胡耀邦、趙紫陽來得有技巧。因此，江的核心地位不致於有立即的危險。

當權派所將面臨的挑釁來自左派，即形象極度保守的教條主義者。例如前任的黨副主席汪東興抨擊改革開放以來，「批左、反左過了頭、變了質」，「名義上搞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sup>①</sup>。前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更是未曾間斷地蒐集改革開放的黑材料，他曾揚言要「戰鬥到只剩下一個人」<sup>②</sup>；他所掌握或能影響的「左派七刊」<sup>③</sup>，持續表露對現行路線的不滿。如果鄧小平死於另一元老陳雲之前，左派必然會仗陳雲威勢，並藉一九九〇年代一度出現「毛澤東熱」為其社會基礎<sup>④</sup>，從思想理論戰線上發動反撲。

不過反對改革開放畢竟不得人心；而且陳雲健康不佳，亦少過問政事；形象保守的重要人物如李先念、王震、胡喬木等，近年紛紛死亡；去年春節以來列名新元老的姚依林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死亡，再使左派遭到打擊。預料左派未來對「江核心」的干擾，力度雖會加強，但影響仍然有限。其他元老如彭真、楊尚昆、萬里、宋平、薄一波、宋任窮，色彩或有不同，但是並無明顯地以「江核心」或現行路線為敵者。

① 據動向月刊（香港）摘錄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國務院」辦公廳刊物動態及二十七日「新華社」內參刊載的對汪東興的訪問。見動向（香港），一九九五年一月號，頁一六一—七。

② 鄧力群，「學習毛澤東，做堅定的革命者」，中國教育報（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③ 指求是、真理的追求、當代思潮、中流、陣地、高校理論戰線及文藝理論與批評七份雜誌。

④ 鄧力群答中流雜誌記者，「關於毛澤東熱」，光明日報（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三、兩組人馬

「江李體制」是鄧小平與陳雲等元老共同商定的第三代班子的主體，江李兩人的共同特徵是最公開、最強烈地堅持「六·四」處理的正確性，其中江是「六·四」事件的直接受益者，李則為鎮壓民主運動的檯面人物。鄧小平死後，「江李體制」會維持一段時間，以防元老們一致決定的「六·四」鎮壓遭到翻案。由於李鵬曾獲陳雲提拔，所以如果鄧死在陳雲之前，江澤民應不致於為了緩和鎮壓民運所造成的民怨而犧牲李鵬；況且任何可能引起「六·四」翻案聯想的因素，都是江所忌諱的。同理，趙紫陽復出的機率就相當低。

江李之外的另一組人馬是喬石和李瑞環。一九八九年喬石在政治局常委會表決是否強硬對付民運時，投了棄權票；李瑞環則未涉及「六·四」鎮壓的決策。此二人形象較江李開明，近年他們分別主持的人大與政協，議政氣氛趨向活躍，全國人大代表在投票時的自主意識增強，而去年初，浙江、貴州兩個省級人大選出了非中央屬意的省長，廣東省人大於去年十一月決議糾正國土廳長；政協系統的言論尺度亦漸寬鬆。預料「鄧後」的人大與政協將會提升其議會性質，而對江李構成牽制。

### 四、兩股勢力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由上海市委書記升任中央總書記，其後繼續獲得更多名氣，主要是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與此同時，原在上海工作並有共事關係的一批人紛紛調升為京官，形成眾所矚目的上海幫，包括：

國家的最高層——正副元首都來自上海；江為國家主席，副主席榮毅仁為上海出身的資本家。  
黨中央——原上海市市委副書記曾慶江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原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仍兼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市長黃菊進入中央政治局。

「國務院」——原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任副總理，且為四名副總理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意識形態部門——原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龔心瀚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原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原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宣揚鄧小平言論的知名寫作班子「皇甫平」主要成員）任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武裝部門——原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巴中擔任全國武警部隊司令員；原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任總政治部主任；原上

海公安局局長王立平任公安部副部長。

對台工作部門——除了江澤民於一九九三年春夏之間兼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外，小組的另五名成員之一——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原任上海市委書記。

另一股來自山東的勢力，似乎未如上海幫那樣受到注意，實際上其能量同樣值得重視，因為山東幫盤踞了軍事重鎮，其特點是都為山東籍，主要包括十名上將：國防部部長遲浩田（招遠縣）、總參謀長張萬年（黃縣）、副總參謀長徐惠滋（蓬萊縣）、副總參謀長李景（滕縣）、海軍司令員張連忠（膠縣）、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招遠縣）、北京軍區司令員李來柱（莘縣）、濟南軍區司令員張太恒（廣饒縣）、濟南軍區政委宋清渭（陵縣）、國防大學政委李文卿（牟平縣）。

其中除了遲浩田是於一九八八年獲授上將外，另九人在一九九三、九四兩年江澤民頒授的二十五名上將中所佔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六，相信是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運作的結果；而日後可能升任軍委副主席並進入政治局甚至其常委會的遲浩田，又與王瑞林同為招遠縣人。未來鄧小平死後，以黨政要津為基地的上海幫和以軍事要津為基地的山東幫，將是大陸政治舞台最大的兩股勢力。

## 五、兩支桿子

槍桿子方面，前述上海幫的于永波、巴中倓分別為政工與武警的第一把手；山東幫則掌控了國防部、總參謀部，以北京為中心的兩大軍區、最高軍事教育機關，以及海軍。此一佈局有助於江澤民抓槍桿子。「六·四」以來，中共要求各個領域加強黨的領導，唯獨對軍隊和武警要求「服從黨的絕對領導」，以強化黨指揮槍原則，也就是塑造江的統帥地位。江亦謀求拉攏軍方，例如軍籍的中央委員從十三屆時的百分之十七，增為十四屆的百分之二十一；去年，江提升了十九名上將、近五十名中將、近百名少將；國防預算則節節升高<sup>⑤</sup>。軍方給予的回應是軍委副主席張震鼓吹：「我軍服從黨的絕對領導，現在最重要的是切行動聽從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sup>⑥</sup>。中央軍委機關報解放軍報則於十月二十九日把毛、鄧、江三人的照片並列刊出，以凸顯三個世代的核心及其交替。

⑤ 國防預算在財政支出所佔的比例，一九八九年為百分之八點三，一九九〇年為百分之八點六，一九九一年為百分之八點七，一九九二年為百分之八點五，一九九三年為百分之八點九九，一九九四年為百分之九點五九。

⑥ 張震，「繼承發揚優良傳統，永保人民軍隊本色」，求是（北京），一九九四年第十五期，頁二。

筆桿子方面，形勢亦朝有利於「江核心」的方向發展。除了前述透過上海幫直接滲入有關機關外，更在宣傳政策上大樹江的核心角色。例如去年元月召開的全大陸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提出的任務，尚屬泛泛，而在今年元月召開的全大陸宣傳部部長會議上，中宣部部長丁闢根明確提出今年宣傳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sup>⑦</sup>。「鄧後」中共對「江核心」的宣傳，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

## 六、兩級分化

中央與地方關係向來在中共政情變化中起微妙作用。一九六六年夏毛澤東南巡，旨在號召地方支持他打擊劉、鄧的中央；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則是運用地方迫使中央收斂其逐漸顯現的保守傾向。江澤民現在既已居於中央位置，也就只會尋求樹立中央權威，壓抑地方。一年多來，宏觀調控、分稅制等，都是為了強化中央；而被撤換省級首腦的有福建、江蘇、黑龍江、遼寧、內蒙、安徽、湖北、新疆、陝西、甘肅、湖南、廣西等。

在去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李鵬、朱鎔基都抨擊了地方主義，接著，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題為「自覺維護中央的權威」評論員文章。今年一月十六日起，該報一連四天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四篇評論員文章：「論統一思想」、「論總攬全局」、「論加強協調」、「論扎實工作」，其基調都是維護中央權威。這反過來顯示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出現問題。由於江澤民缺乏毛、鄧的威勢和魅力，「鄧後」地方主義擴張將不可免，「江核心」若圖加以強行抑制，絕非聰明或有效的方法。

兩極分化的另一表現是「政左」與「經右」的矛盾。鄧小平所提出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形成了政治反右、經濟反左的特色，這種政治左轉、經濟右轉的做法，使得國家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愈難適應。現行路線持續下去的結果，將使這種矛盾隨時激化而對政局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

## 七、兩類挑戰

政治方面，官員腐敗已成為當前黨與群眾矛盾中最突出的問題。據北京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最近的調查，涉及十個

⑦ 中共「新華社」北京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電。

省的七千名城市青年，對官員廉潔性、政府辦事效率等項目的評價最低<sup>⑧</sup>。與此相對應的，是農村白條現象普遍，工人福利減少而不再感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知識分子待遇低落。江澤民就此表示：「腐敗現象泛濫，食污賄賂橫行，嚴重脫離群衆，也會垮台」<sup>⑨</sup>。

其次，自由化與民主化問題是「江核心」所必須面對的。一九七九年的北京之春、一九八一年的批「苦戀」、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一九八九年再反自由化，都說明了自由化與民主化對中共的挑戰不斷，「鄧後」亦然，且還可能加上「六·四」翻案問題。再者，少數民族問題也不容忽視，自蘇聯解體後，李鵬的國慶祝酒辭，都以加強各族團結取代了一九九〇年的促成國家統一，顯示蘇聯之鑒，使中共警覺到因應少數民族問題的緊迫性。

經濟方面，一是去年大陸通貨膨脹率創下歷年最高，達百分之二十一；二是截至去年十一月底，企業間相互拖欠的三角債達六千億元人民幣，超過當年朱鎔基受命處理此一問題時的一倍多；三是國有企業虧損面逾四成；四是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日益明顯；五是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加劇<sup>⑩</sup>；六是農業發展的速度有限<sup>⑪</sup>。這些問題本已讓中共備感困擾，如果鄧死，難免會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果。

## 八、兩岸關係

一九八八年四月楊尚昆曾提出「統一緊迫感」；一九九一年七月江澤民進一步稱「增強緊迫感」。然而隨著鄧小平健康

香港「中國通訊社」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電。

⑧ 本報評論員，「反腐敗要在深入上下功夫」，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⑩ 一九八〇年大陸東、中、西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五十二點三比三十一點二比十六點五，一九九三年變成六十點一比二十六點八比十三點一；東部提高了七點九個百分點，中、西部分別下降了四點四和三點四個百分點。又一九八〇年東、中、西部農民純收入之比為一點三九比一點一一比一，一九九三年變成二點二五比一點七五比一。此外，五百九十二個貧困縣中的百分之九十，分布在中、西部；八千萬貧困人口中的六千五百萬人居住在西部。見中華工商時報（北京），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六日。

⑪ 「一九八五年之後，農業發展減慢了，農民收入增長勢頭緩慢。……（一九九三年）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村居民購買的消費品只佔消費品零售額的百分之四十一，比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三下降了十二個百分點」。見評論員文章，「了解農村關心農民」，瞭望，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頁一。

日差，第三代領導集體必須更專注於大陸本身事務，「統一緊迫感」隨之降低。今年元旦江澤民在對台港澳和海外的講話中，只強調反對台灣獨立，而未像去年元旦那樣把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都列舉出來加以反對，當然這絕不意味中共改變其既定立場，但是口氣較為緩和應可肯定。又最近海基會副董事長焦仁和赴北京與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會談的前一天，相信是國台辦所提供的篇文章（署名郭泰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並由「新華社」與「中新社」轉發，重申反獨並批判了民進黨，明顯別於去年一再指責中華民國當局的獨台甚至台獨傾向。

中共中央台辦主任王兆國於一月二十四日向焦仁和傳達了「江核心」已主導對台政策的訊息，這與中共一再向外國傳達「江核心」主政的用意相同，都在因應「鄧後」即將到來。研判「鄧後」的中共在兩岸關係上，「防獨」將重於「促統」，只要中華民國當局堅持反對台獨並繼續發展兩岸關係，統一問題就不致於被「江核心」提到議事日程的前端，如此完全合乎兩岸的利益。當然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也不會放棄鄧小平所定的一國兩制基調，否則無異給自己製造嚴重的政治麻煩。

## 九、結語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鄧後」的中共在可見的未來，不會再有類似毛、鄧的政治強人。江澤民雖居於核心位置，但陰關重重，如果把鄧在世時的大陸視為穩定狀態，那麼「鄧後」就很可能退到次穩定狀態，未來是否能夠回復到穩定，或反而惡化產生危機，端視「江核心」的智慧如何。江澤民已比前任的胡耀邦、趙紫陽站得都高，況且胡、趙身後還有太上皇；「鄧後」江澤民或難避免元老干預，但是這些元老與當年鄧小平的威勢無法同日而語，所以江有機會不重蹈胡、趙覆轍，其處境也比當年繼毛之後仍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華國鋒有利得多。雖然他患有心臟病，卻不是沒有機會突破中共歷來接班人都非正常下台的記錄，其關鍵可能是他能否主動地、漸進地推展與經濟改革相適應的政治改革<sup>⑫</sup>。易言之，由當權派掌握主導權的和平演變，正是防止非和平演變的重要途徑，也是達到長治久安的基礎工程。

⑫

「如果要從人民共和國的四十年歷史中吸取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必須在延續了若干世紀的把中國人民聯繫在一起的政治制度上有一個根本的改變。否則一個日益發展的社會所產生的壓力，終將積累出強大力量，而把目前的體制炸成碎片。在九十年代及更遠的未來，只有多元化才能維持統一」。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統一的責任」，收錄於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與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九六〇—一九八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頁一〇一一。

## 引言人：葉明德（本中心中國大陸組代召集人）

### 一、前言：中共領導人鬥爭三部曲

一九七八年至今，中共爲了全面推動經濟發展，把部分的經濟決策權交給省、市政府全權決定。但是，整體來講，中央仍然獨攬「施政方針」決策權。因此，研判「鄧後」中共政權性質的變遷、政策的動向，仍以中共中央領導人異動爲主要依據。評估中共中央領導人所屬「政治勢力」的消長狀態，即可測知，大概那一位領導人會執政。得悉特定一股政治勢力佔有「主要」的職位，則可窺知中共大概的「政策」動向。

在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當中，政治領導人大都透過「定期選舉」爭奪執政權。一次或數次「定期選舉」揭曉之後，「政治勢力」消長態勢立見分曉，政治人物執政、在野的前途馬上定斷。同理引申的話，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共領導人角逐執政權力，是不是有特定的「規律」、「慣例」可循？

大體而言，中共政治菁英角逐執政權通常循由三個步驟進行：(一)意識形態暨政策的爭論；(二)人事異動；(三)透過「黨」會議決定，確定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以及新意識形態、政策的合法性。

按中共政權的性質，統治者暨統治階層都須服膺官方意識形態，而排斥所有其他價值、目標與思考模式。意識形態不僅是鞏固統治權威的憑藉，也是界定各項政策之上下限（範疇）。當中共高階層領導人角逐權力時，「在位者」極力維護原有的意識形態，潛在新領導人則可能選擇性的詮釋上一代的意識形態內涵或擷取新的施政理念以塑造新的意識形態並提出新的施政方針。此外，在中共政治菁英內鬥過程中，意識形態暨政策爭論也具備「政治訊息」的功能。經由這些「政治訊息」的反覆辯論，「政治勢力」的分佈乃隱隱約約浮現出來。

鄧小平死後，現任江澤民是否能「先聲奪人」，對所謂的「鄧小平理論」暨施政方針取得「詮釋權」？江澤民詮釋的「鄧小平理論」能否爲黨、爲民眾所接受、從而江澤民的「鄧小平理論」暨施政方針也具有約束力？後鄧時期，有誰、有那些潛伏的「政治勢力」會對江澤民的「鄧小平理論」挑戰、提出質疑？現任江澤民衝命執行的黨政、經濟「改革開放」措施暨附帶引發的社會文化問題當中，有那些措施、問題較容易被江澤民的「政敵」用來作爲「意識形態」（「路線」）辯論、質疑的「議題」（Issue）？

中共政治領導人角逐權力的另一個步驟是「人事異動」，即係共產黨通稱的「組織路線」。中共領導人爭取執政權的另一個焦點是人事的調整。重要「職位」的重整有時與「意識形態」辯論同步進行，其他職位則有時會在最高領導人確定之後，再作搬家換位。中共政權之中，較重要的職位包括「政治局」委員、「軍事委員會」（「軍委會」）主席暨副主席、全國性媒體負責人、「全國人代會」主席暨常委、北京「武警」司令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區」司令、「全國政協」主席、以及重要城市市長暨「市委書記」等。

在以上這些重要職位當中，江澤民佈署的情況為何？若以黨、政、軍、群作為中共政治菁英「權力基礎」的指標的話，現任江澤民與其它潛力領導人作一比較，誰的「權力基礎」比較大？

鄧死後若干年當中，倘若江澤民的「意識形態」（「路線」）無人予以挑戰，而江澤民的人馬也陸續佔住重要職位，則是不是不久之後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就可獲得中共全黨的確認，還是要等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大」才大勢底定？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說是，後鄧時期中共權力鬥爭激烈程度、久暫時間的指標。

以上筆者提出的這項關於中共政治菁英鬥爭三步曲，大抵係筆者研究觀察中共一九四九年迄今，歷任中共領導人角逐執政權之初步「規律」。這個「中共政治菁英鬥爭模式」本身可視為「待證的假設」（working hypothesis），其是否為真，仍待進一步的實證。本文想做的只是，拿這個「鬥爭三步曲」作為「分析架構」把江澤民已經進行、正在進行或將來有機會籌畫的行動，予以組織，用來評估一下，江澤民爭取作為「後鄧時期」最高領導人的可能性！另外，為了分析便利起見，本文暫以江澤民為焦點。這樣的分析設計並不等於說，中共的領導人當中無人可與江澤民抗衡！

## 二、江澤民「先聲奪人」

在「意識形態」方面，江澤民提出「鄧小平理論」，藉以爭取「黨」的支持。遠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時，江澤民首先公開贊揚鄧小平「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作出「歷史性的貢獻」，爾後，中共媒體開始把「鄧理論」與「毛思想」相提並論。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一月分別開「二中」、「三中」全會。在「三中」全會上，江澤民提出「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

同時，為了減少黨內「左派」的攻擊，江澤民率先把「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相提並論。這可以說是，江澤民對「鄧小平理論」重作詮釋的努力。

江澤民重新詮釋「鄧小平理論」的嘗試初見於一九九三年「三中」全會。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中」全會前夕，中共公

開發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收集鄧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二月的主要言論，共一百一十九篇。發行的同一天，在中共中央舉行的「學習鄧小平文選報告會」上，江澤民藉機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比較有系統地回答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以及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堅持這一理論就是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百年誕辰。在這一天中共中央舉行的「紀念會」上，江澤民再度指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與時代特徵相結合，是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按照江澤民的詮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實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的。

江澤民提「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並將它進一步解釋為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思想」一貫相承的思想。其說服全黨的效果為何，仍待觀察。但是，江澤民用他在位的優勢掌握「鄧小平理論」的詮釋權，不僅說明了江澤民深諳「黨」內權力角逐的慣例，也顯示出在「鄧後」權力較勁的過程當中，江澤民已具備「先聲奪人」、暫時領先的優勢。從宏觀的角度看，江澤民反覆宣揚，並要求「全黨」學習「鄧小平理論」，也有加強中共全黨菁英「政治社會化」的效果。

在「組織路線」方面，江澤民也暫時領先。也許因為鄧小平的支持，也或因為江澤民的努力，「江系」人馬已經逐漸進駐北京。一九八九年六月迄今，曾經與江澤民共事的上海官員，有多人陸續調到北京擔任重要職務。這些人主要包括（原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掌經濟、（原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巴中倓調任「武警」總隊司令、（原上海市「市委副書記」）龔心瀚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原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出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原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劉吉調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去（一九九四）年九月，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時，（原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調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現任「上海市市長」黃菊則賦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黨職。

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培養第四、第五代、所謂的「跨世紀的接班人」。在一定程度上，這項「黨」的決定也等於給江澤民汰換黨、政、軍、群中、低層幹部的機會。

軍事部門方面，江澤民也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名義，開始對將官行使「任免權」。一九九四年，中共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在制度上建立「以黨領軍」雛型。這項制度修改的重點有三：(一)取消「一級上將」；(二)中央軍委副主席軍階定為「上將」；(三)「中央軍委主席」不設軍銜；(四)「中央軍委副主席」暨「軍委會」委員之晉升，由「中央軍委主席」授予。最後三、四兩點的修正，確立了未來「中央軍委主席」領「軍」的法源。江澤民以現任「中央軍委會主席」的

優勢，並在鄧小平默許之下，於去（一九九四）年晉升了二十五名上將，另外，在去年，江澤民以「年齡過線」（「屆齡」）為由，免除了「空軍司令」曹雙明上將，而越級提升景學勤少將為「空軍司令員」。今年元月中旬，江澤民再以「屆齡」原因免除了「成都軍區」司令員李九龍及濟南軍區政委宋清渭兩名上將。以上中共「解放軍」軍事將領任免、陞遷制度的確立，加上江澤民「職位」的便利，使得江澤民有較多機會領「軍」。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由於江澤民個人的政治技巧、「制度」的因素或也因為鄧小平操控所使然，「江澤民政權」雛型大致已經確立，鄧死後兩三年期間，江澤民有較多機會執政。然而，江澤民能否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確保其執政地位，還是提前經由「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認可其地位？這就全看江澤民本人在鄧死後的個人表現了。

若以中共菁英內鬥兩個變項：「意識形態」、「組織路線」來看的話，江澤民地位是否穩定，有較大一部分要看「鄧後」這幾年「施政政策」有否失誤、偏差而定。在各項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中，若有一或若干項措施造成較大的「社會效應」，乃至被政敵擴大為「意識形態」的質疑，則江澤民自然倍受壓力，而也有可能以進一步的人事異動因應。反之，江澤民自然可逐步鞏固其執政權。

### 三、江澤民面臨的挑戰

在現行的經濟「改革開放」措施當中，到底有那些政策較有可能演變成為「意識形態」的爭議？

如前所述，雖然江澤民已經技巧地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提並論，串在一起，想預防「左」思想的攻訐，但是，實際上，中共黨內「左」的勢力，仍有可能在「意識形態」領域質疑江政權的施政。主要原因之一是，江澤民背負的「鄧小平理論」，實與「毛澤東思想」有不小的差距。後鄧時期，若有人想質疑江澤民政權，自可祭起「毛思想」的旗幟，對現有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偏失予以批評。另一個原因是，「鄧小平理論」本身似是「左」、「右」派施政理念的大雜燴。未來的「左」、「右」派理論人士，大可輕而易舉地從「鄧小平理論」（**鄧小平文選**）當中各取所需，作為下一回合政治鬥爭的素材。

以「毛澤東思想」特徵、大陸地理、人口分佈特色為準的話，目前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當中，較易引燃「意識形態」爭議的問題主要包括大陸「農業問題」、「國營企業」改革、區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通貨膨脹」控制等問題。鄧死後這幾年當中，假如江澤民的人馬能妥當處理這些問題，則黨內其他菁英比較沒有機會，藉口以上問題的惡化而抬出「毛思想」，或因為這些問題造成的「社會效應」（不滿人士），而有動員形成「反江」勢力的空間。

在「組織路線」方面，江澤民勢力也有隱憂。其一是，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寫明了「重大問題由集體討論決定」。這一條「遊戲規則」有可能給予江澤民的政敵透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一類的機制，與江澤民角逐執政權或牽制「行政權」。其二則是，江澤民能否有效指揮「書記處」的問題。此攸關江澤民掌控「黨」務的效能。江澤民派出的吳邦國能否與胡錦濤共同效力，為江在未來的「黨」的會議操盤？

## 四、結語：「鄧後」中共政權性質轉變的方向？

後鄧時期中共政權會不會來個徹底的「自由化」、「民主化」？還是，觸發一次「革命」？「軍事政變」？

若上述兩種情形不發生，則中共政權會不會在「體制內」進行有限的改革？還是，現在的中共政權性質維持下去、一成不變？

依個人的淺見，由於近十年來中共經濟上的成績大抵尚可，中國共產黨雖仍腐敗，但也表現出它的「適應能力」。是故，後鄧時期的中國大陸不僅似無觸發「革命」的社會條件，也似乎沒有改造為「自由化」、「民主化」政權的動力。中共「解放軍」任免遷調制度的確立，行之有年，「國防預算」亦年年增長。後鄧時期突然來個「軍事政變」，也似乎不太可能。

「鄧後」的中共政權會不會從事「體制內」的改革？這也不太能。原因之一是，江澤民係以「政治堅持保守、經濟膽大心細」為其領導風格。江所以獲得「黨」的支持，也靠著這種政治態度、立場。也因此，鄧死後，江澤民已無靠山，江更須要用「政治左、經濟右」鞏固他的職位、權力，也只有如此，才更能頂得住潛在政敵可能的批評與攻擊。

大體而言，在過去鄧小平執政的近十五年當中，鄧小平似乎在「繼承」這件事下了不少心思，也立下若干的「制度」、「慣例」。另外，鑒於胡耀邦、趙紫陽「接班」過程負面經驗的教訓，鄧小平栽培江澤民的手法應算是成功。

由於鄧小平的刻意支持、「制度」安排的因素、加上江澤民本人的努力，短期內，江澤民執政的可能性較大。假如，往後這兩、三年之內，中共經濟不出現明顯的危機，沒有大規模的天災，同時，江的人馬還能進一步提振農業生產，增加「國營企業」的產值、生產效率。此外，在黨務方面，江若仍能繼續施展其政治技巧贏得「黨」內大多數支持，則「江澤民政權」應可維持一陣子！

## 評論人：熊自健（本中心研究員）

一、我們先將鄧小平身後的大陸形勢與毛澤東身後的大陸形勢，作一簡要的對比，將可理出「鄧後」大陸政治局勢的可能走向。「鄧後」與「毛後」最大的不同點是鄧小平遺留下一條頗得人心，讓人民溫飽發財的「改革開放」路線，而毛澤東去逝時留下的是天怒人怨、一窮二白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其次是毛澤東去逝時還留下一批擁有政治資源、革命經驗豐富，具有相當威望的老幹部，如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彭真、楊得志、許世友、王震等。如今這批中共打天下的老幹部已凋零將盡，遺留人間的幾位也都八十高齡以上，業已交出職位，影響力不大。此外鄧小平已培育出一大批執行鄧小平路線的檯面上人物，江澤民、李瑞環、朱鎔基、喬石等，握有絕大的政治資源與行政經驗。因此毛澤東去逝時，中共的老幹部尚能迅速地重新整合黨政，逮捕四人幫，結束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共同推出鄧小平掌政，制定新的政治路線。「鄧後」將不可能重演老幹部回朝的變局，將是由江澤民等這批檯面上的新幹部，繼續執行頗得人心的鄧小平路線。鄧小平路線賦予了這批執行鄧小平路線檯面人物權力的正當性。然而鄧小平路線亦存在著一些問題，會引發修正路線的爭論，將是向左修正或向右修正，則涉及政治角力諸多變數，須待進一步觀察。

二、「鄧後」將不僅意味著中共打江山的老幹部淡出中國大陸的政治舞台，也是中共「強人政治」轉型的契機。鄧小平自一九八九年辭去最後一位職位國家軍委主席後，是以一個中共普通黨員的身份領導中共政權，是典型的「強人政治」類型。「鄧後」中共在短期內將不再出現毛澤東、鄧小平這類「能文能武」的強人來領導與統治，而將是經由制度的運作來決定政策，這已見於中共「十四大」之後，正逐漸形成「文武分立」、「交叉兼職」的政治制度。此一制度規定中共政治局常委都兼政府部門重要職位，如江澤民任「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李鵬任「國務院」總理，喬石任「人大」委員長，李瑞環任「政協」主席，朱鎔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劉華清任「軍委」副主席，相互制衡；而且也規定中共解放軍將領不得升大將，按規定年齡退休，同時目前中共解放軍將領都無文職官員的歷練，於是形成「文武分立」、「交叉兼職」的政治制度。因此「鄧後」中共在短期內難產生「能文能武」強人，將是實行制度化的契機，由在位者以制度的規定職權來討論、決議、執行政策，不再是聽從服膺「強人」的領導，決策過程與性質有大改變。

三、兩位引言人已將中共政局在「鄧後」可能的走向分析得面面俱到，卻不夠重視中共技術官僚的角色與地位。如果中共是逐步走向制度化，那麼技術官僚的角色與地位必然日趨重要。這點韋伯已有深刻精闢的研析，限於時間在此不引述發揮。如果中共制度化成效不彰，中國大陸爆發出各種問題，時勢造英雄的局面會逼出另一位「強人」，進行統治與領導。

## 評論人：趙春山（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所長）

有關後鄧時期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遷，一般關注的焦點似乎都集中在權力接班這個問題上。由於中共內部對於領導人的更迭，缺乏一個制度化的選擇機制，故繼承危機誠難避免。目前，有關「江核心」的領導體制雖已順利建成，但江澤民是否能有效穩固權力，甚至運用其權力，仍是外界置疑的一個問題。在張榮恭和葉明德兩位先生的論文中，我們皆看到了後鄧時期中共高層人事變動的分析。除此之外，葉明德先生的論文，更觸及到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面的問題。

中共一向標榜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中共政權四十多年的發展過程看，我們確實發現其受到中國政治文化化和社會主義制度影響的部分。而西方學者研究民族國家政治發展的經驗，也提供我們探討中共政治發展的若干線索。據此，個人對於後鄧時期的中共政治變遷，提出下列幾點看法：

第一，根據蘇聯過去領導權力的轉移經驗看，中共在後鄧時期的初期，將會出現「集體領導」的形式，江澤民本人扮演的是一種「群龍之首」（*first among equals*）的角色。隨後，除非其間出現了決定領導人的憲政安排，否則，個人權力逐步集中化的傾向仍難以避免，伴隨著的是一場暗潮汹湧的權力鬥爭。

第二，在後鄧時期，任何領導人的權力合法性來源，將從過去的「革命功勳」（革命的意識形態），轉變到「政策」的成敗方面。因此，改革開放政策的能否落實，將決定領導權力的是否穩固。

第三，外在的「壓力」是中共新領導人用來穩固本身權力的有效工具。在面對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威脅下，中共將不斷強調「民族主義」和推展「愛國教育」，這將取代馬列主義，成為中共後鄧時期的意識形態主流。

第四，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均衡，進而帶動中央與地方的緊張關係，中央將面臨「政令貫徹」的危機，必須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兩者之間，找出新的平衡點。

第五，經濟發展產生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人代會和政協的功能會逐步加強，中共的政治結構必須作出新的調整，共黨的角色日趨式微。

第六，在權力轉移的過渡時期，軍隊仍是維持政治穩定的重要角色。但隨著權力轉移的完成，中共的黨軍關係將發生改變，黨是否能對軍隊進行絕對的領導，令人感到懷疑。在利益的分配上，黨在許多方面必須對軍隊作出必要的妥協。

第七，儘管中共在後鄧時期會面臨若干政治發展的「危機」，但不會出現蘇聯解體的效應，不會產生分崩解體的現象。在民主化之前，中國大陸必須經過一段自由化的時期。開放媒體和訊息的自由流通，將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 討論：

蔡 環：中共政權的轉移，不同於西方民主政治用選舉方式完成，中共政權的轉移過程必然有權力鬥爭，請兩位引言人說明其可能情況。

邢國強：「鄧後」中共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將不會有大的變化，因爲尚得人心，且國際上希望中共穩定，繼續整合在全球市場經濟體制之內。只在組織路線上將出現江澤民、李鵬、喬石三巨頭爲中心的領導班子，小有變化。

曹伯一：請兩位引言人分析喬石的角色與作用，最近是否國際有意在製造與渲染問題，介入中共政治。

裘孔淵：「鄧後」江核心如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左傾思潮必然反撲，江澤民地位會面臨最大考驗，可能會下台，不可過份樂觀認爲江澤民順利接班。

張榮恭：中共政治局常委各有其地盤，任何公開的權力鬥爭將損及既得利益，從而不會進行權力鬥爭，繼續維持其集體領導至「十五大」。向中共領導班子進行權力鬥爭的是極左派，而喬石只有在江澤民犯重大錯誤之際才會挑戰江澤民的領導，「人大」、「政協」將起糾正路線錯誤的職能與作用。

葉明德：江澤民政權不穩將產生在農業問題、國營企業改革、貧富差距擴大、區域不能均衡發展之際，左派將把政策錯誤擴大成意識形態的鬥爭，用毛澤東思想來處理毛澤東的平均主義，仍有號召力。關於外力是否介入中共政權轉移，值得觀察。但喬石長期幹特務工作，握有中共領導人物個人機密資料，因此大多數中共領導不希望喬石當家。

邵玉銘：從歷史的角度看「鄧後」中國大陸政局，一方面要看其「治」的力量是否能穩住「亂」力量，另一方面則要看中國大陸內部與外部（如台灣、海外華人、國際）之間的競爭，如果中共政權政策錯誤過多，意識形態瓦解，將會被迫改變而迎上世界民主潮流。

\*

\*

\*

# 第二場討論會：軍隊角色

引言人：楊念祖（國立中山大學中山所教授）

鄧小平再度病重成病危的訊息，於去年十二月初日本主要傳媒連續報導；十二月十二日中共官方喉舌「中新社」發佈了鄧小平於去年十月一日觀賞「國慶」煙火的彩照。上海解放日報亦於同日刊載了同樣的照片，這是大陸唯一刊登此照的傳媒，其象徵意義引起各方不同的揣測。鄧的照片、容顏朽枯，宛若雕像，令人見之，無不認為大限已至。事隔二日，無獨有偶的，鄧的次女鄧榕在美國紐約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鄧的健康這數月來嚴重退化，並拒絕坐輪椅。鄧榕之言，更加證實日前對鄧憔悴照片推測的真實性。繼之數日，中共領導人和外交部頻頻以「鄧已九十高齡，夫復何求？」模稜兩可，似是而非之語回答外國重要傳媒，更加啓人疑竇。港台傳媒緊接著以傳言內幕消息大肆報導鄧已病危，中共領導集聚北京準備辦後事，大陸、港、台股市巨幅震盪下跌。鄧榕對紐約時報發表談話的次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使得中共中央自去年十一月以來頻頻邀集地方黨、政、軍領導赴中央開會的密集政治活動現象，更令人不得不認為大陸將有山雨欲來的重大事情發生的現象。

這些近兩三個月來以鄧為焦點的中共重大政治現象，一方面說明了鄧小平的健康的確出現了重大狀況，另一方也特意凸顯中南海以江澤民為中心的集體領導為「鄧後」已經進行積極的準備。十二月上旬刊登鄧的照片，以及鄧榕對紐約時報發表有關鄧健康的訊息，似乎是中南海集體領導們有意刻造集體領導的政治接班，以淡化外界對鄧健康問題對中共政局影響的不正常聯想。

雖然北京一再強調鄧的死活對中共政局發展並無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是以中共過去四十多年來專制政體的運作，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所呈現的中央與地方對立衝突的現象，加上過去人亡政息的政治鬥爭先例，不得不令外界人士對「鄧後」政局的不確定產生關切。本文企圖從軍事的層面來分析「鄧後」中共政局可能的發展，並以中共政權接班問題與對台灣未來的影響為研判分析的重點。

## 壹、中共政權接班問題——軍隊的角色與功能

以中共如此專制集權的政體，在權力運作上仍不免妥協平衡的政治運作哲學現實原則。然而中共政治鬥爭的歷史經驗以及依賴人治的濃厚色彩，往往令分析中共政治運作者難以參透妥協平衡的機制。自從鄧小平退出黨、政、軍最高職位，並勸服其他七位大老（強人）依樣畫蘆，表面上似乎強人干政的色彩淡化，但是影響仍在，尤其是鄧小平。但是從政治鬥爭著力的焦點，也就是整體國家發展路線問題而言，從一九八〇年代初至今似乎政治鬥爭的各方在發展路線上已經取得了妥協共識。那就是持續改革、開放基本政策，進行「四個現代化」、政治上堅持「四個堅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政策執行上循「十六字基本方針」、繼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基本發展路線戰略原則的確定，中共總結為鄧小平思想的中心，但是實際上是改革派與保守派妥協的路線，這個基本發展路線經過「六·四」事件嚴峻的考驗，基本上仍未動搖，假設這條發展路線在「鄧後」一段長時間仍未發生變化，吾人可以大致確定，在中共「十四大」以後，中共政權的決策模式似乎已從強人的意志影響轉移至最高政策指導方針之上。去年「十四大四中全會」的決議正是強調以發展路線為最高政治指導原則的最佳寫照。

如果這個以「政策導向」為政權移轉的假設成立，則所謂後鄧時期在政策「接班」問題上，在中共召開「十四大」以後則已拍板定案。在人事接班問題方面，「十四大」使江澤民集黨、政、軍權於一身，使得江成為鄧小平的正式接班人，但是以江在黨、政、軍等方面的資歷與經驗不可能是強人接班的模式。鄧小平所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集體領導接班方式，說明了這種接班只是執行發展路線的人事安排。以江澤民為中心，象徵著「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領導中心，是政權的象徵符號，也是共產黨合法性的代表。集體領導，是後鄧也是「鄧後」不可避免的趨勢，以大陸當前發展的活潑動力，加上各方面問題持續產生的多樣複雜性，權力分工，專業分工的官僚體系只有加速轉型，以江澤民的資淺，不可能面面俱到，政治分權在所難免。集體領導是執行基本發展路線不可避免的決策模式。

以中共政權「黨指揮槍」、「槍鞏固黨」的權力共生基礎而言，軍隊必須要支持基本發展路線，必須要支持，甚至於鞏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集體領導政治決策與運作模式。因為只有如此，才能顯現軍隊支持黨，黨指揮軍隊，才能保證共產黨的執政。軍隊對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國家」發展路線一直是相當支持的。一方面這是黨的最高決議，另一方面軍隊在這基本路線發展中也獲得了利益與權力上的分享，雖然在發展的過程中，軍隊有一段時期在國家資源分配上屈居「四化」之末，但是總體經濟資源的不斷擴大，軍隊的「隱忍」也獲得了相當回報。雖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軍隊扮演著「保駕護航」的

角色，但是這項艱鉅任務之後軍隊所獲得的經濟和政治權利也是相當凸顯的。譬如說在經濟方面，軍辦企業自一九八〇年中就一直積極的進行「軍轉民」工作，這不論在軍隊離休人員的安置上有了出路機會，也提供了軍辦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扮演積極角色的機會。再如，在中央軍委會領軍之下，各種大型軍火公司以軍民兩用的企業方式成立，外銷軍火十數年來替軍方與中共創造了數百億美金的利潤，透過這些軍火交易的管道，軍隊也獲得了許多現代化所需的武器裝備，以及軍事科技。這些中共中央為軍隊資源開創的「窗口」，並沒有減緩中共軍隊現代化的速度。香港「九七」接收問題，軍隊顯然也是最大贏家之一。以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的接收小組，將囊括市面價值數千億港幣的英軍移交地產與設施，在未來將使軍隊的經濟角色與經濟利益更上一層樓。

軍隊在政治上的權力分配所獲得的利益也是相當顯明的。「十四大」以後，軍隊在中共中央權力基礎擴大。軍隊不僅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人數比例增加，歷年罕見，在權力中心所佔的地位也是令人注目的。「十四大」使得鄧小平欽定「勤江澤民」的中央軍委會第一副主席劉華清進入了政治局擔任政治局常委，正式在「集體領導」的決策中心佔一席之地，顯現共軍在政治決策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前年七月，江澤民更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席工作會議上宣布：(一)張震（軍委副主席）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出席政治局會議。(二)遲浩田（國防部部長）、張萬年（總參謀長）、于永波（總政治部主任）、傅全有（總後勤部主任）、朱敦法（國防大學校長）、張連忠（海軍司令員）、曹雙明（空軍司令員），傅言已退（總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機要親信）為第一副主任。江澤明這一項安排，一口氣提升了中共十名軍頭的政治地位，更突顯了軍隊在政治決策核心中的政治地位。江澤民的這項舉措是有深遠的政治意義的：(一)江深知其權力基礎要穩固首先要抓緊軍隊的全力支持，提升軍隊的政治地位企圖獲得軍隊全力支持的回報。(二)凸顯政治上集體領導的模式不能置軍隊於外，一方面突顯軍隊在基本路線上持續「保驾护航」的色彩，另一方面也是決策中心權力平衡的權術運用，使江有更多空間扮演一個決策仲裁者角色。(三)繼續隔絕「楊家將」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防止軍隊中「強人」的東山再起。(四)擴大軍隊事務集體領導的決策色彩，使軍頭之間分權，而江則保有最高的軍隊指揮權。(五)從國家發展戰略的趨勢而言，國防與經濟、政治、社會與外交等各方面的發展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舉凡邊疆民族問題、外交政策、領土主權的爭議、內部可能引發的局部動亂之解決，這些問題的決策過程，軍隊有必要參與和表示意見。從這些方面的考量，江澤民也必須在未來錯綜複雜、充滿不確定與激烈競爭的內外局勢發展過程中，加重軍隊的政治發言權與決策權，一方面使軍隊感覺受重視，穩定軍心，另一方面也需要軍隊的參與穩定大局。從這個政治權力佈局看來，軍隊已經不是單純的為意識形態服務，而是為保持基本發展路線服務，是為集體領導的政治決策運作模式服務。這可以說是「鄧後」軍隊的新時期的角色與功能。

中共中央近幾個月來一再要求軍隊要學習鄧小平思想所要強調的就是要求軍隊支持基本發展路線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集體領導的方式。江澤民在去年連續提拔軍隊百名少將以上的將領，這是具有多重意義的：（一）一方面顯示今天中央軍委會的集體領導模式已成形，另一方面凸顯軍隊支持江澤民所代表的路線。（二）打通軍隊晉升的管道，使年輕將領磨練「鄧後」新時期的工作經驗，並從中再評選軍隊未來的接班梯隊。（三）今天參與決策層面的軍隊接班梯隊，大部分年事已高，江需要在他們有生之年完成軍隊接班任務，因此積極拔擢年輕軍官也符合「鄧後」新時期的需要。（四）張震、劉華清等人不可能長期隨侍江之左右，以軍隊在未來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局勢判斷等角色吃重與能力培養方面，軍隊接班梯隊的思想與實務磨練更要加緊。由此觀之，在軍隊人事上的安排是保障發展路線是否持續穩健、集體領導是否成熟鞏固的必然措施。這種現象在其他領域（例如經濟、社會等）的官僚體系上也同時在發生。

以人事保障路線，以路線審斷人事仍不脫「黨指揮槍」、「槍鞏固黨」的政權生存基本運作。值得注意的是，軍隊人事接班的安排仍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與革命淵源。無論第三或第四接班梯隊的安排，人物上不脫離軍旅的資歷淵源、「革命遺後」與「太子黨」的身家背景，哈爾濱工業大學專業修習、留學蘇聯和高級軍事院校的專業養成背景。這些條件因素在軍隊人事安排和接班問題上是思想與專業品質的保證，也是加強軍隊團隊合作，增加互信的基礎，以保障「以黨領軍」和共產黨執政的權力基礎。

「鄧後」中共接班的形勢，在軍隊方面似乎已出現一定的依循方向，如果這個方向大致不變的話，江澤民在軍隊中的地位是穩固的，因為他代表著一個集體決策的運作模式，而軍隊有相當的政治發言權，他也代表著一個與軍隊共生的利益團體，因為軍隊無論在專業和其他領域的角色功能發揮，都能在這利益共生團體中創造更多的機會。

## 貳、對台灣的影響

從以上所分析軍隊在「鄧後」新時期的角色與功能而言，軍隊對大陸持續改革、開放，穩定發展的基本路線是全力支持的。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共內部不大可能會出現劇烈的政治鬥爭來破壞好不容易形成的妥協平衡政治格局。相形之下，如果中共對台灣採取斷然的軍事手段，若不是民族主義的因素（例如台灣獨立），或外力干涉內政（例如外國介入台海事務）的充分理由，是很可能會破壞「鄧後」的政治妥協與平衡的。

鄧小平曾對軍隊要求在台灣問題上要忍耐，這是具有雙重意義的：（一）鄧要軍隊將重心放在鞏固黨的領導上面，放在對發展路線的「保駕護航」上面，台灣問題是黨中央決策的事，不是軍隊單方面的事。（二）台灣問題有國際因素和台灣內部因素的

考慮，軍隊在這些方面觀察仍有差距，不能枉斷是非。如果鄧的言論屬實，則「鄧後」軍隊在中共集體領導的政治地位，有助於軍隊深入瞭解和判斷中共對台灣問題的底線。而軍隊參與「鄧後」集體領導的安排，也會使軍隊更深入體會改革與政治運作互動的壓力與問題。更重要的，軍隊會逐漸瞭解在對台用武的底線範圍之內，中共對台灣仍有很大的牽制，例如利用今天中共持續改革開放所獲得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對台灣以正式名稱進入國際社會仍有極大的牽制空間；台灣依賴大陸市場的經濟發展方面，隨著香港的回收將更為加重；台灣人民恐懼大陸對台用兵，這心理上的壓力對台灣走向台獨是很大的牽制。因此在用兵底線之內，維持台海的平靜對中共只有百利而無一害。

雖然如此，軍隊在「鄧後」政治、經濟地位的提升，加強軍備的現代化是可以預期的。目前台海兩岸的軍力已有失衡的現象，如果軍隊在「鄧後」政治影響力加深，在下一世紀這種軍力失衡現象將拉大距離。這種趨勢將會使中共增加許多在兩岸政治角力上的籌碼。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們似乎要特別注意軍隊在中共集體領導的決策運作中，對兩岸關係、對台灣的國際接觸、對台灣內部政治發展等的發言意見與影響力。我方的決策者亦必需加重瞭解與研判「鄧後」軍隊在中共政局發展中不斷提升的政治權威與地位，以為因應對策之思考。

\*

\*

\*

## 引言人：丁樹範（本中心副研究員）

近日有關鄧小平健康狀況在其女兒鄧榕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後再度引起人們極度關切。鄧榕在訪問中明確指出，鄧小平健康狀況不佳，雖然她未指出鄧小平患的是什麼病及健康狀況惡化到什麼程度。鄧榕的訪問雖不無向世人與中國大陸顯示，鄧小平隨時有百年的可能，間接凸顯中共已完成接班準備。但是，鄧小平的健康仍然引起極大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的因素有許多，其包括：江澤民能否接班？保守勢力是否會抬頭？內部政策是否會改變？及對臺灣與對香港政策是否會逆轉等？這都引起人們的特別關切。而與江澤民能否接班的疑慮則包括軍隊是否支持江澤民？軍隊是否和地方勾結？這特別是在中共軍隊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大力介人生產經營以後，而與中央抗衡？及軍隊權力繼承中扮演什麼角色等。易言之，中共軍隊成爲鄧小平過世以後的一個重要因素。

### 一、「十四大」以後的軍文分立

「十四大」是中共黨內軍文關係的一個分水嶺。在「十四大」之前，中共實無軍文分立的現象。中共建立政權以後，打天下有功的軍人紛紛取得政府與黨內各種職位。然而，基於派系關係，這些「文人」仍對軍隊事務有相當大的發言權。因而，談「黨軍」關係或黨內軍文關係時不啻談派系與軍隊的關係。易言之，不論是黨主席或總書記，由於戰時培養出的軍隊淵源，都對軍隊有相當影響，形成亦政亦軍的領導人。毛澤東與鄧小平，乃至於葉劍英是這樣的人物。

「十四大」後，上述現象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十四大」後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新領導人中，文人官僚，如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喬石、李瑞環與胡錦濤等，皆無軍事背景。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如張震、張萬年、傅全有、于永波，乃至於劉華清從未出任過文職。這使中共文人與軍人的關係走向新階段。同時，這種因爲世代變遷導致的軍文分立將成爲正常現象。

實際上，「十四大」以來的種種安排均係鞏固這種既定趨勢。「十四大」以後，中共強化了黨對各個部內的領導，此尤以江澤民爲特別突出。「十四大」後，江澤民集黨總書記、國家主席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三個職位於一身，以凸顯他的領導地位，增加他施展權力的正當性。

另一方面，中共軍方藉修正「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以確立軍文分立後文人掌軍的基礎。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於去（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通過上述條例修正案。此修正案的要點有三：分別是取消原案的「一級上將」軍銜；中央軍委主席不授軍銜，而副主席的軍銜編制為上將；中央軍委副主席與中央軍委委員的晉升上將銜由中央軍委主席授予。

這些修正至少有二個意義。第一，中央軍委主席不設軍銜表示日後軍隊由文人領導，而此文人是黨的總書記，以貫徹「以黨領軍」。同時透過法律過程，為日後文人政治精英領導軍隊奠下合法基礎。第二，取消「一級上將」以配合文人軍委主席的權威。在許多國家的慣例中，一級上將為終身職，沒有除役的年限，因而享有極高的榮譽與權威，也對軍隊有極大的影響力。取消一級上將的軍銜似在消除對文人軍委主席領導的可能威脅，間接利於江澤民的統軍。

換言之，「十四大」以來的制度安排顯示，中共高層，包括鄧小平與高層軍官在內，意識到文人政治精英在世代變遷環境下必然形成統軍的後果，而期望透過組織制度上的安排，使文人統軍得到儀式的合法性。但是，這安排或有其脆弱性。

## 二、軍文分立後的統軍

江澤民雖被默許為鄧小平之後的領導者，但他深知中共沒有文人統軍的政治文化，而他和軍隊也缺乏淵源，而必須由其他方面鞏固和軍隊的關係。另一方面，鑑於鄧小平以前曾扶植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皆在任內下臺，造成中國大陸內外對中共權力運作缺乏信心，這使中共軍方不得不接受江澤民於鄧小平過世後領導者的地位。這是雙方關係的脆弱所在。

因此，江澤民必須由其他方面加強和軍隊的關係。這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加重軍人在政治上的份量。典型的例子為軍人在黨中央委員會的比例。「十四大」選出的一百八十九位中央委員中，軍人有四十四位，佔百分之二十三點三。而一九八七年「十三大」選出的一百七十五位中央委員中，軍人僅三十四位，佔百分之十九點四。這特別是每一位大單位的軍事將領皆具有中央委員身分。

除了身分上地位的提高外，江澤民在實質的權力運作上也給軍方參與政治更大的空間。香港的媒體指出，江澤民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做了幾項的決定。其包括：使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及出席政治局會議；遲浩田、張萬年、傅全有、于永波、朱敦法、張連忠、曹雙明列席政治局會議。甚而，退休的老將，如最近才過世的楊得志，也被江澤民邀請列席政治局會議。這使中共軍方在實質政治運作上有更大空間。

第二，「十四大」江澤民大幅度地提高國防經費。「六·四」之後，中共國防費每年皆以超過百分之十的比例增加，遠多於任何其他國家的預算項目。一九八九年的國防費預算為二百四十五億五千萬元（人民幣），到一九九四年，此預算已增

加到五百二十億四千萬元，成長幅度已超過百分之百。再加上中共軍隊自己經營的企業收入，江澤民可以營造出其關心支持軍隊的形象，使軍隊支持他。

第三，江澤民大幅地更動軍隊人事。一方面江澤民在任內晉升了二十五位上將，以獲取高階將領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以晉升方式為手段，使更高階將領榮退，拔擢低階將領，使低階將領的利益與他一致，而支持他的措施。近月盛傳的晉升調整「千將軍」案即為此之典型代表。

西方媒體指出，「千將軍」案內容是在近期有組織、有計畫、有佈署地提拔一批軍級以上軍事幹部，要求他們成為「跨世紀的治軍人才」，並及時授予他們相應的軍銜。為此，除了以上將銜授予大軍區幹部外，還將提拔一些四、五十歲的少壯派將領擔任大軍區的職務，並提升他們為中將銜。據推測，將有超過一百人會獲晉升中將。

第四，加強軍隊的軍事訓練。去年以來，中共的軍事演習相當頻繁，其深度與規模均超乎以前演習內容。這至少有四項作用。其一為加強部隊演習訓練，加深軍隊對戰術戰役熟稔程度，使之沒有時間涉入政治，而能服從黨的領導。「六·四」後中共曾以此方式使軍隊自鎮壓陰影下調整過來。其實，加強軍事現代化亦為中共軍中少壯派自波斯灣戰爭後的主流想法。故加強部隊演訓符合他們的願望，並達到江澤民的目的。

事實上，江澤民在「十四大」上已對中共軍隊的未來角色做了界定，而這些演習相當呼應此角色。江澤民在「十四大」上說：要把軍隊「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不斷增強……國防實力，……」，同時，他更明確要中共軍隊「努力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注重質量建設，全面增強戰鬥力，更好地擔負保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的神聖使命……」。

其二為藉此拔擢新幹部。在沒有戰爭下，演習表現的好壞成為拔擢幹部的主要依據。因此，演習成為必要的甄補標準。其三，演習可使部隊逐漸淡出經濟活動。這特別是基層單位，而達成江澤民期望的「軍隊要吃皇糧」目標，減少軍中貪腐與紀律不良事件。其四，則可達成政治上威懾臺灣，使臺灣不致獨立。

第五，江澤民運用媒體加強塑造親近部隊的形象。江澤民自「十四大」後，多次到軍隊視察，樹立在軍中的形象，並凸顯作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角色。除了赴高層單位，如軍事科學院與國防大學外，江四年來走遍中國大陸每一地方，數百個基層連隊，並每月至少視察一次軍營。同時用媒體報導他關心部隊建設與軍事科技建設的紀實，以塑造他作為軍隊領導者與親近部隊的形象。

第六，用媒體向部隊灌輸價值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混淆的價值觀也影響到軍隊。江澤民提倡「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以突出其當家作主和領導者形象。他也提倡發揚老紅軍服從黨的領導的優良傳統。凡此，都是灌輸中共軍隊

官方所期待的價值，以使軍隊接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領導。

### 三、江澤民面臨的挑戰

江澤民作為弱勢的權力繼承者，在缺乏如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領導魅力下，必然會面臨許多的挑戰。我們必須評估這些挑戰的大小與影響。江澤民可能面臨的第一個挑戰來自同儕政治精英。這是指李鵬、喬石、李瑞環等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中共「十四大」所作的決定之一是取消「十三大」決定的「黨政分工」，這使政治局常委會所有的成員均有兼職：喬石出掌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席，李瑞環出任全國政協主席，李鵬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掌經濟，劉華清掌軍事，而胡錦濤是唯一沒有兼職的常委。這個「黨政合一」的恢復使江澤民的同儕政治精英同樣擁有工具向江澤民施壓，稀釋江澤民的權力。更何況，他們在位已久，政治資歷比江澤民深，很容易形成江澤民的威脅。

爲此，江澤民在政治局大量進用了「上海幫」的人。除了朱鎔基外，去年年底，姜春雲雖來自山東，但爲江所提拔，也算是江的人馬。同時，吳邦國與姜春雲增補爲書記，使書記處書記增加爲七人，變相擴大書記處的功能與職權。由某個角度而言，中央書記處功能的擴大通常伴隨著中央權力的恢復。這也就是說，江澤民想藉著書記處的功能與增加自己人馬在政治局的數量，以有效掌握在中央內部及中央對地方關係的兩者權力。

再就江的同儕政治精英而言，他們雖然在位已久，與北京的官僚系統熟稔，但他們不具有鄧小平般的魅力。更何況，他們不具有江澤民形式上有利的地位：江掌控了軍隊、媒體、交通、政法與組織等機器，因此，他們僅能被動地回應與等待機會，而非主動地創造有利局面。他們更不敢形成組織以與江澤民爭權。

就江澤民的政策作為而言，江似乎仍能在改革與穩定中維持適應地平衡，雖然我們不知道二者間的矛盾何時會爆發。過去二、三年中，中共在經濟上做了財稅與匯率改革，維持了改革的動力。但前者的改革，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使國有企業面臨瓶頸，使江不得不維持穩定措施。就某種程度來說，江澤民維持改革的動力使他不致像華國鋒因爲保守現狀而下臺。換言之，江澤民仍然具有敏銳的政治判斷，至少維持局部改革，而這種「政左經右」使他的政治敵人找不到可資動員的口實與弱點。

「六·四」以後大環境的改變也有利於江澤民的掌權。這特別是指蘇聯的解體給大陸知識分子再思考的空間。再加上「六·四」無情的鎮壓，使知識分子猶有餘悸。這使中國大陸的大環境有了極大的轉變：知識分子鮮再繼續組織群衆，而多投人經濟發展的行列中。這減輕了江澤民的壓力，也使江的政治敵人缺少呼應的群衆，雖然這也不可避免地助長政治冷感症。

另外，蘇聯的解體也必然使江的政敵有所警惕。江的政敵如果想對江發動權力鬥爭，則必須確定行動的後果不會像蘇聯解體一樣，屆時大家都一無所獲。更何況，中共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在降低，失當的權力鬥爭或會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凡此，皆使江澤民處於比其政敵有利的位置。

江澤民面臨的第二個挑戰為地方向中央爭權。實施改革以後，中共為了激發地方的積極性，在經濟上採取「放權讓利」的手段，包括採取財政上的「分灶吃飯」，將地方與中央財政收支分開，地方自負盈虧；擴大地方經濟管理、計畫和資源分配等權限，使地方政府除匯率與關稅等涉經濟事務外，在利率、信貸、稅率、賦稅與價格等方面，均有很大的自主權。同時，地方政府也擁有相當的經濟和法規的制定權。

經濟上的授權使中央與地方關係形成政治上的難題。第一，地方政府逐漸擺脫北京當局代辦人角色，而且在某些方面已取代中央政府的角色。特別是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權增加與指令性計畫經濟逐步縮小後，地方政府的權力已相當擴大，常迫使中央在政策上作出修正，或主動採取作為要求中央提供優惠，甚而不理中央的命令與要求。中央的財政控制力逐年降低。

第二，由經濟逐漸失控引發的政治問題。各地區均以自己地區之利益為優先考量，不理會中央的命令。這已反映到人事任用方面。差額選舉制的實施使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推出的地方正副首長候選人打敗中央提名的人選。自一九八八年以後，浙江、貴州、湖南、湖北、河南與安徽的省級正、副省長換屆選舉時，即曾出現中央人選落選。這相當顯示，地方人大代表會愈來愈以地方利益為衡量候選人的標準。在逐漸喪失人事、財政、價格、計畫、信貸與利率的控制權後，中央政府正面臨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另一波地方挑戰的危機。

然而，我們對此地方挑戰或需要做區分。其一，財政上比較能完全自主的省份應該不多。這些經濟落後的省份在相當程度上恐怕仍依賴中央的補助，而對沿海省份先富起來會不滿。易言之，這些省份或許會支持中央將部分權力或利益收回，以爭取中央政府的補助。而或許只有廣東、上海與一些沿海少數省份才有真正抗拒中央經濟命令的實力。

其二，人事上的權力爭奪也有待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很難了解中央指定人選落選的真正原因：其究竟純係反對任何中央指定人選，抑或中央指定的人選不孚人望，抑或中央指定人選與地方人大代表會有過節恩怨？相對地，於換屆時，何以中央指定人選仍能在其他省份過關？若以楊白冰下臺時的衆多謠言解釋來看，個人因素恐怕居這些省份中央人選落敗的原因。

此外，我們也需要了解地方要爭取的權力為何。很明顯地，地方政府並未公然觸及外交、國防及省級幹部人事任用權。這或許表示，地方政府領導人了解其分際之所在，而不凡事挑戰中央。這或可表示，地方不至因經濟上的擴權而挑戰中央的所有權威，而形成「諸侯政治」。

當然，中央政府也做了一些安排以設法平衡地方的擴權。其一為將地區傾斜政策轉為產業傾斜。這一方面可以平衡地方

差距，同時又可滿足內陸省份對於優惠措施的迫切需求心理。換言之，這有轉移資源於內陸地區的用意，使「特區」不再限於東南沿海，而及於全中國大陸。

其二為努力推動地區性經濟合作，以遏止地方主義經濟上自我封閉性的發展。透過經濟聯合與形成地區性經濟，可避免地方間差距的擴大，增加富裕地區的負擔，並由地方間的互動達成削弱富裕地區自主的能力。  
其三為增加地方首長間的輪調。此舉自一九九〇年六月又開始實施，其目的最初在抑制逐漸坐大的廣東勢力，欲將葉選平調離廣東。新的作法也讓中共「國務院」官員有機會與地方首長對調，減少地方首長因自主性和利益因素而不願調北京，並可藉此加強省籍幹部間的對調，防止地方勢力紮根。此外，將地方首長調任中央政府，使之親自體會中央之困難，也有助於緩和中央與地方關係。

其他經濟上的作法則正在實施或構想中。這包括中央與地方的分稅新制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重組人民銀行使之由省而跨省，以實施中央銀行的功能，避免與地方掛鉤；建立國有產權制度，使產權職能與地方政府職能分離，抑制地方政府干預企業介入經濟過程的能力，為企業改革創造條件；及向地方政府發行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強制認購的國債，以便切實削弱地方政府的財力等。上述分析如果正確，則可表示江澤民在面對來自地方挑戰時仍可處於不敗之地，雖然江澤民無法恢復毛澤東時期的中央大權在握的局面。

江澤民面臨的第三個挑戰為貪腐與社會秩序的逐漸瓦解。改革以來，中共固然有許多成就，而使中國大陸成為未來世界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但各種民怨也隨成就而來。在農村，因打「白條」而形成農村問題；農村過剩人口造成大量人口移動的「盲流」；國有企業因競爭力低弱而導致失業人口；各種「舊社會」勢力隨著改革開放逐漸復甦，包括宗族、地下教會、黑社會，乃至於知識分子因社會之腐敗而極度不滿現狀。

中共對這些社會挑戰有其應對方式。此即當任何有組織形式開始發展時就予以清除掉。「六·四」以後，中共對此發展出一套模式。此即在組織活動的初期，就以滲透與逮人方式將為首者關入監牢，使之不致有機會發展。除了以滲透與逮人外，「六·四」後中共在各地人民武裝警察中普遍設立了快速反應單位，施以鎮暴訓練，而避免直接動用軍隊鎮壓，也避免政治精英與軍隊間因鎮壓而起矛盾。

中共政權這種恐怖統治方式能迅速清除異議分子，使社會百姓心生恐懼而不敢輕易附和任何可能與中共對立的團體與個人，使全社會重入中共組織中，避免了任何自發性社會組織，更避免任何可能取代中共的組織出現與發展。這種恐怖統治雖不人道，且不利於社會與經濟長期發展，但就某種程度而言，利於中共統治。

即使因改革開放而衍生出的氏族與宗族也無法形成氣氛。天津的大丘莊事件是個典型的例子。大丘莊固然是經濟發展的

樣板，使中共傾注了相當多的資源，且與個別領導人——李瑞環——的支持有密切關係。但事件的發生顯示，中共統治者無法容忍大丘莊的領導人禹作敏避開中共的制度，使中共不得不運用統治機器，使大丘莊重回中共統治的掌握中。同時，與大丘莊相似的組織，其形成是靠中共的支持，中共領導人不會使這類組織坐大到可以與之抗衡的程度。因此，宗族性質地方性組織，僅能發展到村層次，無法形成全國性氣氛。

另一方面，中共也設法緩和民怨。中共每年在過年以前會緊急撥款給地方政府，指定作為補發教師工資、農民賣糧所得，乃至於工人因工廠關場之失業救濟等，緩和社會群眾不滿的壓力。甚而，中共放慢經濟改革的腳步，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破產，也與穩定社會有密切關係。除了舒緩民怨外，中共也對人民壓力留有洩洪道（exit），此即鼓勵人民轉往經濟上的享受。這種逸樂取向雖造成社會的冷漠，但不會對中共的統治造成衝擊。

此外，中共所創造的統治正當性的一種神話仍然為老百姓接受。此即在「六·四」時，除少數人外，政治異議人士都未挑戰中共統治的正當性，而只要求中共進行改革。這種神話——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使大陸百姓別無選擇，而繼續接受中共的統治。

鄧小平過世後，中共對於「六·四」的處理引起世人的關注。實際上鄧榕最近的講話或可相當化解「六·四」對江澤民與中共政權可能的衝擊。鄧榕說，鄧小平的「六·四」鎮壓是不得已的痛苦選擇，否則中國將陷入災難。鄧榕的說詞間接表示，鄧小平承擔「六·四」的任何責任，使人們不必向江澤民或中共當局追究責任。這如同中共在處理文化大革命，將一切責任推諉給「四人幫」，而黨沒有錯。這種出氣筒式的安排可化解江澤民與中共於鄧小平過世後因「六·四」翻案可能面臨的衝擊，而將責任歸之一個已經作古的人。

再加上中共最近的極力緊縮資訊措施，以避免任何單一事件因為媒體的失控而衍成全國性行為，此或表示，江澤民在鄧小平過世後，在短時期內或許不至於面臨社會全面失序，以致他或中共的權威瓦解，或作出類如「六·四」時期關鍵性的抉擇。

## 四、中共軍隊與政治

在權威國家中，軍隊與政治呈現密切微妙的關係。中共與軍隊的關係有一些特徵。第一，軍隊依附黨而有正當性。共黨理論強調，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而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一環，在無產階級國家裡，軍隊自然受黨的領導。這表示，軍隊在意識形態上不能發動政變推翻黨，否則軍隊喪失其存在的正當性或成為軍閥，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由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中

共軍隊不致發展成類似中南美洲「軍事執政團」(junta)。

第二，由上述特徵，我們可以推知，黨的存在與保持至少形式的團結，是中共軍隊行動的依據。「六·四」前，中共內部的衝突使軍隊不知所措，直到鄧小平下令鎮壓且為政治局常委會背書，軍隊才得再有所依據而行動。這顯示，當中共黨內能夠團結，或有明顯的主流派時，中共軍隊就有所依循。

第三，中共軍隊在歷史上皆係被動地介入政治。在邏輯上，中共軍隊的被動介入與上述二項理論有關。而歷史的事實也證明或加強我們已有的認知。這表示，在鄧小平過世後，中共軍隊不會主動介入政治，包括逮捕政治領導人與維護社會秩序，除非中共形成新的領導群，且此領導群取得了黨內的領導地位。

如果以上三個特徵是正確的，則鄧小平逝世後，中共軍隊將會支持江澤民。江澤民已被塑造為中共與中共軍隊領導者的形象與認知。同時，江澤民在權力繼承上，尚未有明顯的挑戰者；或即使有，目前仍未明朗使中共軍隊不必轉移效忠對象。此外，地方對江澤民的挑戰仍在可以處理的範圍內，而不致影響江澤民的領導，乃至於使黨中央的權威瓦解。至於社會非黨組織的挑戰仍在村的層次，不致形成全國性的動員，也沒有對中共意識形態統治正當性足以構成挑戰的理論出現，使軍隊的認同失去方向。

軍隊的結構性也使軍隊易於認同既有的統治方式。軍隊的想法比較保守，傾向於維持現狀，而不認同急劇性改變。這使軍隊強調秩序而非劇烈變革。中共軍隊在一「六·四」的表現也符合此一傾向。這特別是指中層、比較年青軍官，他們雖相當同情「六·四」民運人士的主張，但仍然認為他們（民運人士）要求的太早了。這強調秩序維持更易使中共軍隊支持既有政權，但另一方面追求工具的現代化與效率。

軍隊與地方關係是另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中共實施經濟改革以來，其軍隊因官方預算不足以支持需要，再加上其過大的編制，而允許軍隊有限度地介入經營活動。隨著改革的進行，軍隊已過度地介入經濟活動。此時人們擔心，軍隊企業與地方關係過於密切，以致互相勾結而違抗上級與中央。

上述的懷疑似乎言過其實。第一，中共軍隊企業大多為軍隊獨資企業，與地方共同合資不多。中共軍隊享有許多優惠，加上得天獨厚的條件，與地方合資的必要性不迫切。第二，軍隊大型企業為三大總部、軍區或軍級單位所直接掌控，這些單位主官基於個人政治前途，必然不敢與地方勾結。第三，一九九三年年底以來，中共軍方加強實施企業上繳歸口，使軍級以下的單位只有副業生產能力，斷絕下層單位與地方可能的糾纏不清的關係。第四，地方向軍隊提供的後勤支援，如供應糧食，係在政策下的低價供應，而非地方向軍隊故意示好之舉。而地方與軍隊互相提供技術以突破生產障礙，則屬官方的「雙擁」政策範圍內所允許——擁政（府）愛民，擁軍優（軍）屬——之舉，也不構成勾結。

此外，軍辦企業之所得主要用於改善軍人的福利，而非取代既有的國防預算。福利包括軍民兩用人才訓練費用，彌補水、電費用之不足，子女教育、醫療及營舍修繕等。舉凡國防科技的研發、軍人工資與作戰訓練費用則由國家預算支給。因此，軍辦企業可能使軍隊稍微自給自足，而不必仰賴地方或與地方勾結。

軍辦企業並非沒有缺點。其主要缺點是助長貪腐與紀律不振的現象，也會形成軍隊好逸惡勞心理，對戰力的培養構成極大危險，也不利於長期建軍。但這些缺點不構成對政權立即明顯的威脅。中共軍方實施的企業上繳制度即是為了解決此類缺點而設計出來的對策，其似乎最後要把所有企業集中到三總部或大軍區層級，並由專人管理，以實施「軍企分開」。

## 五、軍隊與對臺政策

自從「十四大」後，西方盛傳中共軍隊在中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甚而，其對政策之影響及於兩岸關係。香港媒體報導，劉華清曾於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對其軍事院校負責人會議上提到了中國統一問題。他強調如果臺灣走向「臺獨」，則兩岸間的戰爭將不可避免；他也提出了一個統一時間表。

我們很難查證到劉華清是否真的講了那些話，但歷史是一個有用的索引。民國初年王權瓦解後中國分裂為軍閥政治時，各地的軍閥均認同中國應該統一，但對如何統一的方式，則各軍閥觀點互異。在北京的軍閥認同以武力快速統一，而在南方的軍閥則主張在維持現狀下慢慢統一。這反映出彼此立場的差異：在北京者在法理上代表中國政府，故希望快點統一；而在南方者則希望維持分立局面。其後，北方軍閥仍不惜出兵造成軍閥大戰。

中共當局今天承襲著大中國思想文化，復又面臨繼承危機，這特別在冷戰後中共遭遇的挑戰，如民族分裂與和平演變，其軍方的對臺政策與其高層政治精英的想法應是一致。而舊社會軍人固有的強調「力」取仍為中共軍人思維的方式，在此思維方式下，其對臺政策或將比文人政治精英更僵硬。更何況，其政治教育中強調維護祖國統一為解放軍職責的口號，將使中共軍隊無法面對中國分裂的事實，而使解放軍失去目標與方向。

\*

\*

\*

## 評論人：鄭曉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共政權仍然處於高度人治的狀態。在「一人繫天下安危」的局勢下，最高領導人的生死，對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都有全面和深遠的影響。軍隊一直是中共政權的柱石，鄧小平去世後的中共黨、軍關係走向，也就成為預測未來中國大陸政、經局勢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楊教授這篇文章所探討的問題，對於我們了解「鄧後」時期的中共局勢，具有重大的指引性和啓發性。

楊教授指出，中共政權第二代與第三代領導班子的更替，以政、經發展路線為主軸；也就是說被拔擢的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幹部，是為了保證在鄧小平死後，繼續執行鄧的政、經基本路線，即政治上堅持四個基本原則，經濟上保持開放改革。這個論點，極為中肯，也是分析「鄧後」局勢所必須把握的基準點。

在這個基準點上，楊教授進一步指出，透過拔擢新將領與黨、軍結構體的文武決策交流，中共新一代的黨軍共生權力結構體，在「十四大」之後，基本上已經確立。在權力分配、基本路線認同、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軍隊都可能傾向支持以江澤民為首的集體領導。此外，為了確保基本政經發展路線能順利進行，中共黨軍共生體除了力求內部穩定之外，也將避免對台用兵（除非台灣宣布獨立或外國勢力干預台灣）。這些都是非常深入和平允的分析，極具參考價值。

顯然，楊教授認為，在鄧小平去世之後，短時期內，中共政權尚不致於發生嚴重的路線鬥爭與軍人干政現象。對此，評論人深表同意，這似乎也是多數中國觀察家所抱持的觀點。比較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長期而言（如三、五年之後），上述情況是否會出現呢？這是楊教授文章著墨較少之處。

整體說來，楊教授的文章，從宏觀的角度著眼，掌握了重要的常數和變數，並且進行了相當周延的分析。此外，這篇文章行文流暢、理路清晰、首尾一貫，可讀性很高，避免了一般學術論文常見的缺點。當然，如果這篇文章要發展成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還要加上許多引註，以呈現論點的依據和論文的可信度。

## 評論人：施哲雄（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丁教授的大作從以下五個方面：1、「十四大」以後的軍文分立；2、軍文分立後的統軍；3、江澤民面臨的挑戰；4、解放軍與政治；5、軍隊與對台政策，來分析後鄧小平時期的中共軍隊。此一分析架構個人基本上是贊同的，雖然在文章中沒有註解，但是從中亦可看出作者引用了不少資料，大部分的論點也相當正確。

對此一大作從以下幾方面作評論：

一、作者在文章中沒有註解，這也許是因為時間過於緊促或受限於篇幅，但從一篇學術論著應具有的條件而言，這將是美中不足之事。

二、論文題目所指的意涵有些模糊，「後鄧小平時期」是指鄧小平死後的時期呢？還是後期的鄧小平時期？如果是後者，應更進一步指出從那年算起。此外，「中共軍隊」作者在文章中似乎僅指正規軍，但「中共軍隊」除正規軍之外，「武警」亦包括在內，作者應在文章中先予以確定。

三、武警對中共未來政局的發展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人數五年之內從六十一萬人升至近一百二十萬，司令巴忠倓是原上海警備司令，被視為是江澤民的心腹，武警因級別序列的問題和正規軍之間存在著矛盾，亦使江澤民和李鵬之間造成摩擦，其擔任的任務是「內衛」工作，對中共未來政局的演變影響很大。（爭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號）

四、「十四大」的文人和軍人分立的安排是一大特點，但「軍銜條例」的修訂規定「中央軍委主席不授軍銜」，這是為配合江澤民的身分所作的一時的權宜安排呢？還是成為固定的制度？這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如果是後者，是否會引起軍方的不滿？

五、江澤民為鞏固鄧死後的領導地位，近年來大肆討好軍方，但他因缺乏和共軍的淵源，這些討好動作是否保證其領導地位就能穩固？從以前華國鋒的例子可看出和共軍的淵源對權力地位的穩定是相當重要的。如果江澤民須賴共軍的支持，則他能否有效指揮共軍，將令人懷疑。

六、共軍並非鐵板一塊，從其成立與發展的過程，事實上是存在著許多山頭，彼此之間亦有許多矛盾，毛澤東亦坦誠此一事實，因此在分析共軍對中共政局發展的影響時，應考慮到此一因素。

七、江澤民和同儕政治精英是否存在矛盾？領導階層的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其派系的組合情形為何？這對未來中共政局發展影響相當大，應進一步加以分析。

八、地方黨政當局和地方駐軍的利益結合，是否有可能造成地方的割據局面？此一問題在鄧死後缺少強人的情況下，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九、最近一段時期，中共一再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此一原則共軍無人不知，因此中共不斷強調此一原則，是否意味著以後黨難以指揮槍？

十、對中共軍隊的稱呼，不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或簡稱「解放軍」，這是涉及立場的問題，因為中共使用的一些名詞是經精心設計，含有政治的目的，我們不宜跟著使用同一名詞，因此對中共部隊的稱呼，僅用「共軍」即可。

## 討論：

宋國誠：「鄧後」上海幫與山東幫之間權力衝突，將是「鄧後」中共政局穩定的變數，山東幫對上海幫挑戰的力度將會達到何種程度？

邢國強：軍人經商對中共政權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中共軍人忙於經商，將減少對政治的參預，有利政權穩定，但軍人的利益受損時，將會向江澤民挑戰，不利中共政局的穩定。

楊念祖：同意鄭曉時教授的評論。以長期的眼光來看，中共軍隊可能會發生內鬥，引發政變。但目前軍隊與政治相互妥協，形成共生體，相互平衡，相當穩定。以中共歷史經驗觀察，在長期是有可能打破此一共生體妥協平衡的局面，爆發政變、內鬥。

丁樹範：中共軍隊的派系過去都是以一、二、三、四野來劃分，但今天這種分法是否有效呢？中共軍隊今天的派系發展的情形，難以窺探。以一九九二年楊白冰下台來看，這是否為聯合派系運作的結果，形成新的派系呢？中共一九八〇年代建立國防大學以及老將的凋零，過去一、二、三、四野的派系已有所改變。江澤民與軍隊是互惠的關係，至於軍隊和地方的關係是軍隊指導地方。軍人經商的問題，江澤民、張震都已申令要緊縮，軍隊內部自會調整。

施哲雄：山東幫是有保駕與監督的作用，如江澤民背離鄧小平路線，山東幫會予以制止。

鄭曉時：中共從來就沒有真正建立過「以黨領軍」的制度，毛、鄧都是以個人的領袖魅力領導軍隊，而非「以黨領軍」。中共要建立以黨領軍的制度則有待觀察，它必不同於西方的文人領軍的制度。

\*

\*

\*

# 第三場討論會：經濟政策

引言人：董瑞麒（本中心經濟組召集人）

本文假定鄧小平在今年或明年逝世，「鄧後」大陸政局仍將維持現況，鄧的改革開放路線在「江李朱集體」領導下仍繼續維持下去。這一集體領導體制「鄧後」到底能維持多久呢？這取決於下列三大變化因素：

一、「六·四」是否平反：「鄧後」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將更趨尖銳，可能藉「六·四」翻案，在一九九七年中共第「十五大」和一九九八年「九屆人大」進行攤牌。屆時李鵬將出局，群雄逐鹿的結果可能再定於一尊。

二、體制內整合能力：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加緊控制軍隊、推動分稅制、強化黨的基層組織和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以強化中央領導權威。

三、緩解社經矛盾：鄧小平的漸進改革路線，經過十六年的推行，衍生了惡化的通貨膨脹（去年創百分之二·七的最高峰）、嚴重的失業問題（農村剩餘勞動力一點五億人，城鎮官方失業人口六百萬，另國有單位冗員三千萬人）、貪污腐化愈演愈烈、貧富差距擴大、諸侯經濟等五種解不開的經濟矛盾。

倘「鄧後」中共集體領導階層不能同心協力，強化體制內整合能力，並謹慎地採行有效對策去緩解上述經濟矛盾，尤其是通貨膨脹，則中共在一九九七年前勢必無法實現和平過渡。

「鄧後」危機四伏，集體領導人可能會團結一致，採行以穩定為第一優先的經濟政策來鞏固共黨政權。在此種情況下，大陸經濟中短期可能發展趨勢如下：

一、溫和改革派的經濟政策持續佔上風：「鄧後」保守派依然成不了氣候。溫和改革派主張穩步改革和進行適度經濟宏觀調控的主張，將持續壓倒激進改革派的通脹無害論和「雙加快」（加快改革和加快發展，只有加快發展才能化解危機和促進改革）的主張，獲得「江李朱集團」的支持。

二、繼續採行適度的宏觀調控：由於國有企業虧損和三角債情況嚴重，累積財政赤字高達五、〇六七億元，「鄧後」中共調高利率（雖然目前實質利率高達百分之十）和減稅來抑制通脹的空間相當有限，只能繼續採行適度的緊縮政策，同時保持百分之十左右的經濟成長，避免經濟回落過猛加劇失業和社會不穩。

三、放慢改革步伐：爲了社會穩定，「鄧後」中共將不會再推出新的價格改革措施，暫緩建立宏觀調控總體框架，只選擇性地進行現代企業的改革試點。

四、中央和地方的經濟利益衝突加劇：爲了強化體制內的整合力量，中央正努力做好分稅制，向地方收回若干經濟權力，卻遭到地方諸侯或明或暗的抵制。鄧猶在世中央都無法完全壓服地方，「鄧後」中央權威減弱，中央和地方的經濟利益衝突將更趨尖銳和日益表面化。

五、漸進地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爲了避免對失業造成太大壓力，推動現代企業的改革將僅止於試點。虧損的小型國有企業將通過出租、拍賣、出售部分股權或土地，改造爲股份合作制、職工共有制、三資企業或投資主體多元化的股份制企業，進行非國有化的改造。

六、強調農業發展：「鄧後」大陸農業很難突破耕地銳減（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分別減少一、一〇〇萬畝和九三七萬畝）、工業產品價格上漲侵蝕了農業生產的誘因、幹部向農民亂攤派、亂收費加重了農民負擔、糧食品種和品質不符市場需求等結構性的發展瓶頸。然而糧食增產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人均糧食佔有量從一九八四年的三九二公斤下降至一九九三年的三八五公斤。糧食的需求卻隨著收入的增長而不斷增加，早在一九八六年便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人口的平均糧食消費量逾四百公斤，北京、上海和天津高達五二四公斤。未來中共將面臨糧食長期短缺，尤其是南方短缺優質的稻米。中央將增加農業投資，力促地方重視農業。

七、加速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未來中共改革的成敗端視國企的改革，惟國企改革的三大障礙是產權、政府機構的職能轉換、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來保障辭退的冗員和離退職人員的基本生活。「鄧後」溫和改革派將不會觸動產權和政府職能，惟將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作爲國企改革的突破口，加速建立全大陸社會保障制度，統籌提供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

八、大力發展中西部鄉鎮企業：大陸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區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蓬勃發展，使東部經濟增長速度快於中西部。「鄧後」爲了縮小地區發展，中央將增加對中西部鄉鎮企業的貸款、鼓勵東部企業赴中西部合作發展鄉鎮企業，大力扶持中西部鄉鎮企業的發展。

九、外資流入將放緩：過去三年外來實際直接投資高達七二一億美元，成爲全球第二大吸引直接投資的國家。今年中共持續進行緊縮政策，大陸的資金短缺將限制投資者的運作空間以及企業的相對配套資金。此外，沿海地區的工資、地價上升快速，使沿海地區的生產成本高於鄰近國家，這些不利因素將減緩外資的流入。目前百分之八十的三資企業集中在東部，大部分是從事加工業和房地產。未來中共將鼓勵外商投資基礎設施、基礎工業、農業、森林，同時讓出大陸市場來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

十、去年大陸經濟成長百分之一一·八，而通貨膨脹高達百分之二一·七，創四十多年來的最高峰，物價漲幅超過經濟成長的增幅高達百分之十，顯示大陸經濟發展已步入危險期。但改革以來的發展軌跡顯示，只有在經濟成長大幅回落之後，隔年通貨膨脹才會跟著下降。今年經濟成長預計約在百分之十左右，因此通貨膨脹率仍居高不下，可能徘徊在百分之十六左右。

十一、經過十六年的改革開放，大陸經濟已逐步走向國際化、市場化、非國有化和地方化，「鄧後」仍將朝這四個方向發展。惟領導核心以穩定共黨政權為第一要務，政策上仍不敢大膽地邁向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和法制化。

十二、大陸長期累積的高通貨膨脹、失業問題嚴重、所得差距拉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地方主義高漲等矛盾，「鄧後」短期仍無法有效緩解。但因近十年來平均儲蓄傾向高達百分之三四、外資大量流入（前年和去年實際直接投資分別為二六〇億和三四〇億美元）、人民幣匯率已趨穩定和非國有經濟蓬勃發展，「鄧後」大陸經濟仍將繼續維持高速而不穩定的成長。

\*

\*

\*

引言人：王春源（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

## 第一節 「鄧後」大陸會繼續「改革開放」說

一九八〇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r. Lawrence Klein 於一九九四年元月十三日表示，世界各國的經濟都在走向自由化。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已有十六年，大陸是一步一步地開放，因此，其成效超過前蘇聯與東歐地區。即使鄧小平過世後，大陸應還是會繼續採取「改革開放」政策，開放市場，以吸引外資及外國之技術。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於一九九五年元月二十三日表示，東南亞國家應從經濟觀點來定位中共，從龐大的經濟商機觀點，來取代舊有的政治、軍事威脅論。馬哈迪認為，立於中共軍事、政治威脅的基礎上而建構起的安全秩序，將「不僅是一個錯誤、不良的政策，而且也可能帶來莫大的危險」。馬哈迪強調，透過東亞經濟協調會議（EAEC）之組織功能，將有助於世界銀行（IBRD）所預言的，在二〇二〇年之前，東亞地區將在中國大陸的領導下，成為世界六大經濟體之一。只要大家都能攜手合作，這樣的目標並不難達成。他在馬中關係論壇中，呼籲世人：「在後冷戰時代，應以實際的戰略性思考，重新定位中共的角色」。顯然，馬哈迪亦深信，「鄧後」大陸會繼續「改革開放」。

台灣工業總會理事長高清愿、台灣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台灣奇美實業董事長陳文龍與台灣西陵電子董事長吳思鍾等產業界代表，於一九九五年元月多認爲，「鄧後」中共政權可順利移轉，大陸經濟已不可能再走回頭路，經濟必定會發展下去，其經濟基本面不會改變。江李政權必定可和平的繼續接掌政權。  
筆者亦認爲中國大陸在「鄧後」，爲順應世界政治社會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與國際化等潮流，必將繼續執行「改革開放」政策。

## 第二節 「鄧後」大陸難繼續「改革開放」說

英國經濟智庫（EIU）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報告，很多企業家都被大陸看起來潛力無限的投資環境所惑，惟一旦「鄧後」，中共當局的領導權將很難和平轉移，故大陸投資具有很高的風險性。EIU 已把大陸之投資環境由「B」級降

至「C」級，並稱可能再繼續降級。亞太區之EIU 表示，「鄧後」幾個可能繼承者間之爭鬥，將引起中共當局之政策癱瘓，集體領導中無人有足夠的權力，來減緩過快之經濟成長。大陸未來仍將維持高速之經濟成長、高度之通膨與擴大之貧富差距。

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警告，隨著大陸經濟於一九九五年之可能冷卻，在大陸做生意可能會大賠的。大陸雖有現代化之資本市場，卻沒有健全的金融和法律系統。此外，大陸的公司，根本不在乎「負債」，故隨著一九九五年政策之緊縮，企業償債的問題，將更為惡化，會有更多外國企業發生收不到帳款之問題。有些公司找代理人去討債，這些代理者卻將討來的債，用於投機的房地產與股票，使問題更為惡化。商業周刊勸告外商，絕不要貸款給那些不是北京主要銀行所保障之企業。

筆者認為上述EIU 之主張，過份低估江澤民、李鵬、朱鎔基與吳邦國等領導之掌控權力與政經認知能力。至於商業周刊之看法，則屬大陸經濟在市場自由化過程中所產生之社會外部性（social externalities）、財產權界定與經濟制度健全化調整等問題，不會妨礙到大陸「改革開放」之基本動力。

## 第二節 「鄧後」大陸經濟之主要巨變

根據中共「中國經濟信息社」於一九九五年元月十一日之報導，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在北京舉行的「二〇〇〇年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分析與預測國際會議」中，提出未來十六年大陸經濟將發生下列十個主要巨變：

一、大陸將是世界經濟成長中之最活躍地區。到二〇一〇年大陸之GDP 將位居世界前三或四位。平均每人收入，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

二、產業結構將明顯變化，並逐步趨於合理。第一產業比重大幅下降，第二產業比重繼續上升，第三產業比重逐年增長，並有較大提高。

三、各產業領域內之技術提高。到二〇一〇年，大致可實現工業化和初步現代化。

四、大陸居民的平均消費水準將達到新興工業國家之水準。其將由一九九〇年的人民幣七二三元，上升到二〇〇〇年之二、四〇〇元，再上升到二〇一〇年之七、五〇〇元。

五、人口成長態勢仍然迅速，到二〇〇〇年，人口將達十三億。出生率趨緩和人口壽命延長，將導致老年人口比率升高。人口充分就業和人口老齡化，不久將成為大陸須面對之間題。

六、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至二〇〇〇年，大陸農村將出現城鎮化之高潮，可吸收相當數量之農村剩餘勞動力（labor surplus）。

七、面臨資源枯竭與環境污染之壓力。到二〇一〇年，城市環境污染強度緩慢下降，但新城鎮之環境污染逐漸提高，中西部地區污染率將高於東部地區。

八、區域經濟呈不平衡成長現象。未來十年，由於自由市場作用，區域間之不同階層人群間之收入分配差距將會擴大。九、社會主義之市場經濟體系建立，並逐步完善。到二〇〇〇年，建立起市場經濟架構；到二〇一〇年，整個市場運行機制逐步形成。

十、大陸與世界之聯繫更加密切，對外貿易之年平均成長率將高於同期之經濟成長率。以大陸、日本、南韓為主體之東亞共同市場將會取得共識，並初具雛型。

另一方面，根據中國社科院於一九九五年元月所出版之一九九五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亦即：「經濟藍皮書」）之內容，其主要經濟政策建言，勢必深遠影響到「鄧後」大陸經濟之「改革開放」重點者，計有：

一、加強改革財政稅收和貨幣金融銀行措施，以有效發揮宏觀微調之功能，防止盲目追求名目產值與過速之名目總需求，以壓下通貨膨脹。

二、為遏止急迫之高通膨問題，短期內以治標措施為主，例如：對人民生活必需品實行限價，對某些關係國計民生之短缺產品，適量增加進口，以平抑大陸市場價格。但不應為了治標而引起更複雜之治理通膨之治本問題。

三、體制改革之重點，在於農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與投資體制改革。目前，已具備進行這些改革之有利條件。當前需加緊進行「破產法」之完善與實施，以及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體系」。

四、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以實現經濟「軟性著陸」之過程中，須同時兼顧「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兩方面，不可偏廢其一。在所面臨之通貨膨脹問題、投資規模問題、農業問題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等，有很大成分是結構問題，其包含著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各種因素，是不能完全由總量控制之方式來解決。

五、要達成穩定中求經濟之快速成長，一個可行方法是採取較緊之金融控制和較鬆之財政政策，但這可能引起財政預算赤字過大之問題。一九九四年是大陸實行新的財政預算制度之第一年，當年財政赤字已佔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十八，已屬偏高。赤字規模過大，使財政之調控物價失效，大量發行國債，會排擠掉民間投資，使資金轉向消費，對國民經濟之長期發展不利。長期間，非債務性之財政收入，應與財政支出保持平衡。財政改革，應堅決執行經常性之稅收收入，只用於經常性支出；發行國債之集資和國有企業上繳之國家生產性稅收，應只限於用在投資性之財政支出。

六、應使利率之決定，市場自由化，使其能真正反應資金之供需平衡，進而使社會商品之總供需均衡，以穩定經濟。目前，應提高短期利率，來防止通貨膨脹之發生。

七、在展望一九九五年之大陸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方面，主要有：(一)一九九三年開始以來之宏觀調控，已使物資供給、資金供給、存款餘額、外匯儲備等，有了顯著改善。(二)一九九四年之一系列重大改革，已有積極效果；一九九五年提出之國有企業改革措施，將可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三)大陸市場仍平穩增長，潛力大。(四)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之基礎設施投資，已形成供給能力；現又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之建設。(五)各地方與各企業要求發展經濟之積極性未減，熱情很高，只要妥為引導，即可獲致快速之經濟成長。(六)國際環境變化中，有利於大陸之因素，仍持續發展中。

八、在展望一九九五年之大陸經濟發展的不利條件方面，主要有：(一)在通貨膨脹居高不下之情況，若宏觀調控力度，過早鬆動，投資再現膨脹，增長再加速，而觸發惡性通貨膨脹，則終將迫使宏觀調控採「硬性著陸」措施，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不僅浪費了資源，且可能被迫放慢改革步伐，使「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都嚴重受挫。一九九四年年中出現的投資加速與惡性通膨現象，隱含存在這種危險性。(二)為控制惡性通膨，由於調控力度過猛或未注意調控方向，而引起經濟回降速度過猛，造成失業人口劇增，人民收入下降，出現結構性之「停滯性通貨膨脹」問題。一九九四年出現之國有企業生產速度回落過猛，以及食品價格與部分生產原料價格嚴重劇漲之背反現象，亦隱含存在有這種危險性。

九、一九九五年或「鄧後」大陸之經濟工作重點，是強調經濟成長的質量、效益、結構等內容；以百分之九左右之成長速度、百分之十以下之物價上漲和與經濟成長基本同步之投資成長為調控目標，保證於一九九六年完全達成，以期為「鄧後」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全發展，創造有利之投資環境與條件。

十、中國社科院對一九九五年大陸之生產總量及產業指標、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物價、居民收入與消費、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財政、金融與對外貿易等主要經濟指標，作了如附表之預測。

## 第四節 結論：「鄧後」之大陸經濟前景與台灣因應

根據一九九四年世界競爭力問卷調查報告，大陸已被全球一、七四七位企業領袖，公認是二〇一〇年最具競爭力之國家與新興市場，美國居次，日本第三，德國、南韓、新加坡則分居第四、第五與第六；至於台灣則未被提及。

為何全世界之企業領袖，多數看好中國大陸之經濟前景？一言以蔽之，即大陸之經濟體制的重建，所產生之經濟發展的基本推動力或法則（the fundamental law or forces of motion）是經濟起飛後（take-off）之快速自力成長（self-sustained

growth ) 的走上坡，而非走下坡。此表現在下列之現象中：全球最高速之經濟成長率，通貨膨脹未持續性惡化，全球最高的投資率與儲蓄率之一，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私營企業、國營企業改造等市場經濟之擴大，技術專業之任職，高效率之迅速經濟立法，過去農業發展成功，匯率調整成功，外貿收支大幅改善，外匯存底超過五〇〇億美元（排名世界第六位），外資仍然持續大量內流，三級產業結構顯著升級，進出口貿易結構顯著轉變為較高附加價值內容，以國家產業政策來引導外資投資於「四結合」之投資項目，以及獎勵投資、不遺餘力等諸方面。事實是，開放十六年來，大陸已建構出一條邁向「富強」之正確道路。

另一方面，在大陸十六年來之「改革開放」過程中，雖已出現下列現象：所得分配不均，區域發展不平衡，國營企業效益低落，財政收支赤字開始惡化，農業資源外流，高通貨膨脹率，固定資產投資波動大，基本公共設施不足，外債負擔重（已超過一千億美元），失業人口近二·六八億，農村剩餘勞動人口約一·二億，社會不安，法治不彰，貪污賄賂陋習盛行，以及苛捐雜稅亂等等，但此乃大陸在經濟快速動態發展過程中，追求「效率」致富之短暫失衡現象，並非不會做良性改善，亦

附表 一九九五年大陸主要經濟指標預測值

1.總量及產業指標	
GDP 增長率	10.5 %
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率	3.5 %
農業總產值增長率	4.2 %
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率	14.0 %
其中：	
重工業	15.0 %
輕工業	14.0 %
建築業	11.5 %
重工業總產值增長率	16.0 %
輕工業總產值增長率	15.0 %
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率	10.5 %
其中：	
交通運輸郵電業	12.0 %
商業服務業	9.0 %
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總投資	19,000 億元
增長率	22.6 %
實際增長率	11.5 %
3.價格	
全國零售商品價格上漲率	13.0 %
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率	15.0 %
投資品價格上漲率	10.0 %
4.居民收入與消費	
城鎮居民實際人均收入增長率	6.5 %
農村居民實際人均收入增長率	5.5 %
城鎮居民總消費實際增長率	8.5 %
農村居民總消費實際增長率	7.5 %
社會消費實際增長率	12.0 %
5.社會商品零售總額	
名義增長率	20.0 %
實際增長率	6.5 %
6.財政	
財政收入（不含債務）	6,120 億元
增長率	17.0 %
財政支出	7,495 億元
增長率	17.2 %
赤字	1,375 億元
7.金融	
新增居民（農村與城鎮）存款	5,350 億元
增長率	30.0 %
新增貸款	6,500 億元
新增貨幣發行	1,500 億元
8.對外貿易	
進口總量	1,404 億元
增長率	17.0 %
出口總量	1,357 億元
增長率	18.0 %

。 非靜態不變的，何況大陸之主要領導人，亦皆對這些現象，有深切認知，且正急切尋求治理措施中。因此，只要大陸持續建構「改革開放」之「創富」經濟體制，則「鄧後」之中國大陸經濟前景，不僅樂觀可期，且必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之重心。

台灣產品在面對著前有美、日、歐體等經濟強國之競爭，後有東南亞、中南美、中國大陸等快速新興經濟區之競爭與追趕，台灣經濟之生存與壯大，除依靠自身不斷產業升級外，尚須以台灣現有之科技、人力、資金、管理等經濟優勢，去結合台灣所欠缺之「資源」，以提升台灣在世界市場上之競爭力。其實踐方法，須台灣之整體投資環境改善到能大量吸引本國與外國企業，皆願在台灣來投資營運具有比較利益之各種產業，使企業根留台灣，而市場腹地與生產資源腹地則伸向世界五大洲，其中特須將大陸規劃為台灣最主要之市場與生產資源腹地，故兩岸直航乃絕對必要，否則，即屬空談企業根留台灣。倘台灣之各種綜合社會政治與財經政策，能改善環境到足以誘導國內外企業在台灣來研發、生產製造、營運、轉運配送等等，則台灣自然會水道渠成的轉型匯聚成「世界營運中心」，而非只是政府所盼之「亞太營運中心」，使台灣自然孕育為世界（非只是「亞太」）航空轉運中心、世界航海貨物轉運及分裝配送中心、國際主要貨幣拆借交易流通之金融中心、世界電信使用交換中心、國際媒體放收交換中心、世界高附加價值產品製造與研發中心等等。因此，台灣經濟之前途與因應「鄧後」之大陸經濟，乃在台灣自身點點滴滴之整體投資環境的迅速有效改善，須先反求自己條件後，再以政策誘導國內外企業根留台灣，空嘶喊遠大建設口號，乃空中樓閣，五日京兆耳！

## 評論人：張榮豐（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以經濟發展而論，由於經濟有其客觀的規律。因而「鄧後」其經濟發展方向，也應有其客觀不受影響的一面。董先生這篇文章所描述的趨勢，是屬客觀不受影響的部分。

不過，如果從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對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國大陸經濟所起的作用來看。則經濟改革亦有受到領導人個人影響的部分。董先生這篇文章，在這一部分的分析中，似乎比較缺乏。

如能就以下幾個部分做一些分析，則對讀者瞭解「鄧後」經濟的走向會有幫助：

一、未來要從事的私有制改革，因涉及到基本的意識型態問題，因而亟需有像鄧小平這樣聲望的人物來推動。但「鄧後」是否仍有這樣的政治人物？如缺乏這樣的政治人物，則大陸私有制改革將呈現何種現象？

二、法制化的缺乏，對其進一步經濟改革有何影響？

三、由於缺乏類似鄧這樣的最後仲裁人物，所以社會、經濟的不安定勢必會反射到政治面，這一部分其具體之情況如何？

我想，「鄧後」中國大陸經濟情勢的分析，似乎還應包括以下兩大部分：

一、大陸經濟未來的改革，這至少有：市場改革、所有制改革、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經濟法制化……等。這些都是「鄧後」中國大陸新的領導人必須面對之改革情勢。

二、當前大陸經濟問題的收拾，至少有：通貨膨脹的治理、中央與地方關係之調整、貪污腐敗的整頓，以及面對國際化後內部產業的衝擊等，這些也都考驗「鄧後」中國大陸的新領導人。

\*

\*

\*

# 評論人：陳德昇（本中心副研究員）

## (一) 優點與特色

1. 個人同意王教授所提，「鄧後」中共仍將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因爲此一政策已難走「回頭路」，且是中共政權獲取合法性的基礎。
2. 個人贊同解決當前台灣經濟問題與兩岸經貿關係的要務，是積極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此不僅有助於提升國內的投資意願，且是抑制非常規因素導致資金外移的有效辦法。
3. 論文對當前大陸經濟發展優勢、缺失，以及發展前景，做相當多的介紹與引證，提供多元的思考方向。

## (二) 缺失與問題

1. 文中過多引用學者與研究報告之觀點，而缺乏本人的分析意見，顯難對「鄧後」的情勢變化做明確之論證與具針對性的剖析。

2. 論文中多爲宏觀性的常識性判斷與過於樂觀的預期，而缺乏微觀的結構性分析，因此難以說明「鄧後」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具體影響爲何？例如，鄧生前即與陳雲有路線分歧，鄧先死會有何影響？中共對改革、開放速度、幅度存有認知差距，鄧死後會有何改變？鄧生前，中共保守勢力仍相當強悍，故有「南巡」的反撲行動；如果没有鄧「南巡」講話之傳達，「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也難確立。因此，鄧死後的政經負面影響不容低估。

3. 文中並未對大陸日益嚴重的地方主義演變做深入的分析。事實上，去年以來實行的分稅制改革，已遭地方省份的強烈反彈，地方主義盛行，中央權威式微之勢已日益明顯，這是在鄧生前的基本態勢。然而，「鄧後」地方主義的發展，尤其是以地方經濟利益與實力爲主軸的政經格局，皆是值得做深入分析的問題。

4. 因應對策之分析似缺乏針對性，政治與安全因素亦未考量。換言之，「鄧後」階段，吾人在對大陸經貿政策的運作應採取何種策略，較符合台灣安全與利益的需求，王文似未考慮政治與安全因素；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可能產生的變局，如何使台灣的經濟損失降至最低，亦是吾人不可忽視的課題。

5. 中國大陸近年來的改革、開放確已發揮實質效果，經濟持續成長與人民生活改善，則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中共重建體

制，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構，仍難令人有過於樂觀的預期。主因在於：配套條件不足與體制的結構性缺陷。例如，在政治方面，專政特權產生的腐化與官僚體系導致行政效率低落；經濟方面，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性，以及市場發展落後；在法制方面，法律規章不足與法治觀念蕩然；社會福利方面，財政能力不足、規畫能力有限，皆是難點。因此，評估大陸經濟情勢既要充分估計其發展優勢，但亦不能低估其缺失與流弊所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

### (三) 檢討與反省

準確判斷中共動向是相當困難的，因為變數既多且複雜。

美國學界曾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反思為何事件之前做了錯誤的判斷與樂觀的預期。結果發現，美國學界接觸的大陸人士多為開明之士。換言之，這些開明之士的「樣本」，並非接近事實的「母體」。實際上，專權、保守與僵化的權力核心階層，可能才是具影響力、具實權的中共。

\*

\*

\*

## 討論：

丁樹範：美國對中共的經濟發展評價兩極，美國學界曾過份樂觀估計日本與前蘇聯的經濟發展，但歷史經驗證明並非如此，因此須審慎地估計中共的經濟發展，不宜過份樂觀。

張鎮邦：董瑞麒分激進改革派、溫和改革派須加以說明其派系的成員與基本理論，激進改革派如只是一些學者的論點，則不構成經濟路線的一派。

裘孔淵：中共政治制度束縛了經濟發展，「鄧後」中共的政治制度不改變，將會影響其經濟成就。

葉明德：中共的宏觀調控是根據市場的情況來做，還是中共政府權力介入經濟管理，中共當局對宏觀調控是否有不同意見，形成對立？

蔡 琦：中國大陸人民對政府的期待，已明顯超過政府的能力，是否能從此一角度分析。

王春源：從中國大陸的償債能力、外資流入、貿易額、受益人數來看，中共的經濟發展勢頭看好。中共的宏觀調控基本上是市場導向，亦有擴大中央權力之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力量是源自市場、競爭。至於國有企業成效不彰、財政困難、法令不周全等問題，這是存在於每個國家，不僅是中共政權才有這些問題。

董瑞麒：基本上我把中共的經濟路線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它們隨著問題、時間而有改變。保守派已沒有市場，國有企業必定要改革，所有制的改革也一定要進行，目前因穩定的需要，使改革步伐較慢，以開放保持經濟活力。

\*

\*

\*

## 第四場討論會：兩岸關係

引言人：宋國誠（本中心副研究員）

### 一、鄧小平的生死問題

近日由於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接受紐約時報訪問，透露鄧小平健康一日不如一日的消息，使得鄧小平的生死問題以及鄧死後中國大陸可能的變局，再度引起各國的重視。目前，有關鄧小平「病危」的消息仍只是傳聞。鄧榕以「直系親屬」發表談話，雖然具有「消息來源的接近性」，但細查鄧榕談話內容，其重點還包括鄧小平與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及眾所矚目之「六·四」事件的「責任關聯」問題，因此，鄧榕的談話具有為鄧小平辯護脫責和作出某種政治交代的意味，果真如此，則鄧小平病危狀態可能接近真實，但是考慮到鄧榕目前正為她的著作《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作宣傳，因而也不排除鄧榕以鄧小平的「健康問題」作宣傳的訴求重點。而在中共官方方面，過去對鄧小平健康問題一貫以統一口徑的「健康良好」為說辭，但在鄧榕談話披露之後，中共官方加上了「考慮到一個九十歲以上的老人」為健康狀態的但書，顯示中共當局在相當尷尬情況下，以儘量接近鄧榕談話但又不能明確公佈鄧小平健康狀態的方式，作了曖昧的反應。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中共高層對鄧小平的家人十分不滿，特別是有關「六·四」大鎮壓和一九五七中共反右運動的談話。官方認為這是鄧家只為鄧氏一人所作的澄清，但卻干預了黨和國家的政策。目前中共中央正在大力宣傳統一思想和加強協調，為鄧小平去世預作心理準備，但鄧榕的談話使這些工作受到了困擾。鄧榕接受訪談的事，中共外交部是在訪談內容發表之後才知道的。而中共的規定是所有敏感性訪談內容事先一定要獲得中央宣傳部的批准。加上鄧榕的談話又和中共官方說法不一致。中共外交當局表示，中共的兩名副總理目前都按計畫前往外國訪問，兼任副總理的外交部部長錢其琛正在非洲訪問，而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朱鎔基正在歐洲訪問。中共當局的立場是，如果鄧小平病危，兩名副總理即不可能出國訪問。

綜合以上所分析，鄧小平目前應是處於「健康惡化但還不致於立即死亡」的狀態，但可以確定的是，鄧小平已經來日無

多。因此，鄧死後對中國大陸內部的衝擊，以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就值得我國人密切的觀察與高度的關切。

本文以「兩岸關係的基本發展趨勢」和「鄧死後對兩岸關係的衝擊變數」為途徑，以及後者的衝擊變數是否會影響前者的發展趨勢，來分析鄧死後兩岸關係的可能變化，最後則以我方應有之對策為結語。

## 二、兩岸關係的基本發展趨勢

過去兩岸關係的發展，簡單的說，是一種「敵友互現」、「高低起伏」的發展趨勢，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交錯雜陳。以「不利因素」的面向來說，主要是受到「交流性糾紛」（如千島湖事件、蘇澳海難事件）和「國際代表權」（廣島亞運事件、參與聯合國提案）兩大因素的影響。在「有利因素」方面，則以海基會、海協會持續性事務協商和兩岸經貿關係為維繫。

就有利方面來說，主要以民間交流持續擴大和經貿關係穩定增長為主軸。去年一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分別在北京、台北、廈門和南京舉行四次事務性協商，其中包括兩次「焦唐會談」。儘管由於司法管轄之界定以及文字表述之歧見，四次協商並無具體成果，但第二次焦唐會談促成了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來台，增進大陸當局對台灣政經民情的瞭解。唐樹備來台期間，提出兩岸在現有會談基礎上進行「政策性對話」的主張，基本上獲得我方相當正面的回應，顯示兩岸交流的層次與議題，皆獲得相當程度之進展。而幾天以前，在北京召開的兩岸第七次事務性協商和第三次「焦唐會談」，並沒有受到鄧病危傳聞的影響。儘管三項協議最後還是未能順利簽署，但這次會談至少表現了四項特色。

首先，在「焦唐會談」首日，雙方負責人就以最大的「語言藝術」和中國人慣有的人情滋味，營造輕鬆與融洽的氣氛。不僅避免以刺激性話題為難對方，也迴避提出敏感事件徒增困擾，顯示雙方經過多次會談之後，已由生疏猜疑逐漸進入理解和諧的階段。

其次，在這次會談中，雙方都展現了對現有議題的妥協性，以及對未來議題的開發性。我方一開始表示並不排除經濟議題的商談，並主動強調源自「辜汪會談」以來對兩岸會談「經濟屬性」的重視。大陸方面則首先表明可以台商權益保障為商談起點，並在隨後有關協議的文字表述方面上，採取妥協合作的態度。這種互有禮讓的作法，逐漸顯露兩會協商的成熟性格，也表現了開放、坦然與務實的態度。

第三，這次會談明顯的要比過去幾次更能獲得雙方授權機關和民意的支持。例如唐樹備一開始表示，大陸方面「注意到『我行政院院長連戰』當前兩岸關係以經貿為主軸」的談話，對我國亞太營運中心將有助於兩岸經貿發展而表示歡迎等，都能獲得我官方與民間的接受。又如中共「國台辦」新聞局局長張銘清，在會談期間，也一改過去對兩岸媒體互設辦事機構和

發行報紙「條件還不成熟」的保留性看法，並主張透過兩會協商管道，推動此一構想的具體化。而我方對於大陸方面安排會見中共統戰部部長王兆國的計畫，也採取淡化政治禁忌的開放態度，算是對兩岸政策性對話的可能方式進行了嘗試。第四，同時也是這次會談最具特色的進展，就是基於過去文字表述方式屢次發生爭議，兩會會務人員在各自主管部門的授權與同意之下，仿效「辜汪會談共同協議」所採取的務實作法，決定採用繁體與簡體兩種版本，在不涉及文字內涵認知差異前提下，分別記載兩岸不同的習慣用語，以解決事務性議題所面臨的文字表述的爭議。換言之，兩會採取「內容一致、文字各便」的技巧，突破了長期以來困擾雙方的文字表述困難。以上四項特色，皆顯示兩岸會談已建立起一種「溝通性常軌」，並發揮「互相制約」和「相互規範」的效應。

兩岸經貿關係的持續熱絡，毫無疑問的是維繫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基本因素。根據香港海關統計，自一九八七年以來，兩岸間接貿易金額一直維持兩位數字的增長，即使最低一年的一九九〇年，也有百分之一六·一的增長。而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九月，兩岸經香港轉口的間接貿易金額已累積至七十億五千八百萬美金，比一九九三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一〇·五。而據中共海關的統計（即不限經香港轉口者），此項貿易金額已逼近一百億美元。而在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九月之間，台灣對大陸的出口依賴度已創下歷年新高，達到百分之一七·一，同期台海兩岸貿易相互依賴程度也創下歷年新高，達到百分之九·六。而一九九四年一月至八月，台灣經香港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達四十六億八百萬美金，佔台灣全球順差金額的百分之一二七·七五。由以上數字顯示，兩岸關係處於相互倚賴逐步加深的狀態之中。

就不利方面來說，以中共持續攻擊台灣的分離傾向和抑制我國人格為主調。自去年六月以來，李總統登輝先生先後發表有關「主權統一」及「台灣地位」的觀點，引起中共強烈的攻擊。對我國推展「渡假外交」、「南向政策」等，也提出批評，指責我方意圖「搞兩個中國」。行政院陸委會發表「兩岸關係白皮書」以後，中共也以「滑向台獨之路」、「詆毀大陸社會制度與革命成果」等觀點提出攻擊。中共官方甚至正式發表談話，反對兩岸統一乃是「制度之爭」，重申以「一國兩制」的構想實現國家統一，說明「一國兩制」的內涵是：著眼於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時考慮兩岸制度不同而兼顧各方利益的正確政策，並且強調兩岸制度之不同，不應成為分裂與阻礙統一之藉口。

其次，去年九月間，中美洲九國提案支持我國重返聯合國，中共以「台灣沒有資格加入聯合國」為由，強烈表示反對。爾後，中共對我外交封鎖持續升高，進而延伸至抵制李總統出席廣島亞運及亞太經合會。對於李總統提出「兩岸領導人可在國際場合會晤」的建議，亦表示反對。在此同時，中共軍方强硬派亦有一萬不得已時，以武力粉碎台獨迷夢的論調產生。由此顯見，兩岸關係的不利因素，主要在於中共認定台灣始終抗拒統一、想搞獨立，其堅持以北京為中央實現主權統一的立場，未曾有所鬆動。

儘管如以上所述，兩岸關係有利與不利因素交錯複雜，但基本上不利因素的存在並沒有阻礙兩岸有利因素的增加，同樣的，兩岸有利因素的增進，也沒有改變兩岸基本政策的對立和僵局。換言之，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之間並無明顯的因果消長關係，兩岸基本上是在各自堅持的政策底線上，力圖使雙方關係在穩定而有序的軌道上前進。

### 三、鄧死後對兩岸關係的衝擊變數

鄧死後對兩岸關係的衝擊變數，基本上應環繞在如下幾個方面：

#### (一) 鄧小平對台政策的指導性與持續性

鄧小平的對台政策思想，是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基調，其實質乃是一種以政治談判代替武力對抗的漸進性、折衷性政策。這項政策雖然被視為「鄧小平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構成部分，但此一政策業已形成多年，並已成為中共全黨對台工作的基本方針與執行規範，換言之，即使鄧小平死亡，他的對台政策，就解決台灣問題上，仍然具有最高的指導性與長程的持續性，將不致因為鄧死而發生重大的轉折和改變。

#### (二) 鄧死中共權力過渡、領導繼承、派系衝突

鄧死後，中共內部的穩定與否，應是衝擊兩岸關係的最大變數。首先就權力過渡而言，雖然鄧小平仍被視為當前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但鄧小平已多年不參與實際決策，也不直接干預黨和國家政務的推行，換言之，鄧小平的地位並非一般的「國家元首」地位，而是一種精神性的「象徵領袖」。當前中共的實際權力已轉移至第三代領導班子，如果有所謂權力過渡問題，也只是一種「權威宣示的補充」，而非權力結構的變遷或轉移。就領導繼承來說，目前江澤民已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黨內儘管對其有所微詞，但無人可以與之公開挑戰。即使出現了江澤民「地位不穩」現象，也還能維持一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責任分工式的集體領導架構」，此一架構應至少可以維持一段時期的政治穩定與團結。而就派系衝突來說，實際上，在鄧小平生前，黨內反市場經濟的左派勢力已經大部分被清除，保守政治元老的權力也被完全架空。其中可能引起派系衝突的因素，仍然是「六·四責任歸屬」問題。目前在海外民運人士中，存有一種看法，那就是「一個等待反撲的『三中全會派』」，意指趙紫陽的力量仍然存在。目前趙紫陽的問題因鄧小平活著而被「壓了下來」，未來是否會翻案，以及翻案後關於責任歸屬問題，是可能引發政治紛爭的因素之一。

### (三) 社會問題的「危機移轉」和「挫折補償」效應

依據近年來的觀察，大陸目前積存且具爆炸力的社會問題，主要有三大問題，分別是農業基礎不穩、國有企業大量虧損以及物價波動、通貨膨脹問題。

當前大陸農業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增產而不增收」。問題集中表現在農民收入下降、負擔加重、農業投資不足和農村勞動力過剩。自一九八五年以後，大陸農民的收入就進入停滯狀態。「七五」（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期間，農民收入增長只增長了百分之一·三。而耕地面積的減少則加重了問題的惡化，目前大陸農民的人均可耕地只有一·六八畝，而一九九二年大陸農村人口已增至八億六千萬人。人口增長抵消生產收入，農村剩餘勞動力和農民閒暇時間增多，生產要素配置嚴重失衡，這些都是農村不安的巨大因素。

國有企業虧損以及所帶來的職工失業問題，也具有相當的爆炸性。據中共勞動部統計，未來五年內，大陸的失業率將高達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而隨著人口的繼續增加，到本世紀末，將有二億六千八百萬人處於失業、待業狀態中。目前中國大陸職工總數約在一億四千七百四十四萬七千多人，從人數來看，就足以構成中共政治穩定的「極大變數」，處理不當，將是一個政權存亡的重大問題。

物價波動與通貨膨脹問題，原因與型態是多方面的，除了一般總量供需失衡及貨幣發行因素之外，主因是財政因素、國有企業虧損的因素、大幅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以及工資增長的速度高於勞動生產力的速度等。這些問題將直接導致社會不安和國家財政能力的下降。到一九九〇年以前，中共財政赤字的累積額已到達八八〇億元，以國際預算收支標準衡量，扣除債務收支，則高達一·八七一·二億元。財政能力是國家宏觀調控以及所有經濟槓桿的支撐，財政虛弱外加通貨膨脹將使中共的社會控制能力大為下降。

以上三大問題，皆互有牽連並產生相互激化的效果。在社會問題惡化或失控之下，中共並非沒有可能在「危機移轉」和「挫折補償」的情境下，對台採取緊縮或強硬的姿態。

### (四) 台灣方面的反應

鄧的死亡，對中國大陸而言，應是一種類似的緊急狀態，台灣方面的反應和舉動，對中共而言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敏感性。台灣如果在鄧死後採取一種貶鄧式的「反共作戰」，升高台獨論調，實施過度的軍事備戰，緊縮兩岸交流事項，擴大國際外交作為等等，都容易引起中共的緊張甚至採取激烈的反制行動，從而影響兩岸關係的穩定。

## 四、結語

基本上，「擴大交流，增進互信，逐步實現統一」是當前以及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的趨勢，兩岸關係自解凍以迄今日，已累積了相互參照的互動模式，此一趨勢應不致受到鄧死的重大影響。但是考慮到鄧小平是過去以來唯一能夠「穩住大局、制止爭亂」的人物，鄧的死亡，無疑的將使中共全局控制能力減弱，特別是民族獨立運動、地方離心勢力以及類似天安門事件的民主運動若乘機而起，中共「強硬治理」或「武力鎮壓」的手段就會出籠，從而使兩岸關係受到波及，增加不可預測的變數。

我方對於鄧死後中國大陸一切可能的變化，應採取高度冷靜和特別謹慎的態度，尤其應避免刺激或觸怒中共，以「最平常的作爲」，觀察並等待鄧死之不利效應的消除。個人認爲，我官方發表一簡單悼文，並申明繼續維持兩岸關係的良性交往，應就是最恰當之作爲。

\*

\*

\*

## 引言人：吳秀光（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 一、前　　言

就中共決策研究之方法論言，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著重的面向不同、分析的層次不同，各有其不同之功能，提供研究者以不同的角度去檢視同一現象，期間的關係應是互通互補而非互斥的。相信真能遊乎某一研究方法之中融會貫通，必能超乎其外了解其他研究方法中相通的道理，並欣賞其他方法獨到之處，甚至將其他方法所得之重要結論為己用，恢宏本身範疇。

一般傳統之中共研究者，視中共研究唯一獨特的區域研究，通常較由歷史、制度、人物著手，將研究者對事件邏輯過程的卓見透過敘述的方式表現，華人學者通常在這種方法上較佔優勢，誠如吳安家所言：「許多七十年代『西』方學者的錯誤判斷，中方學者大都能加以避免，中方學者多數對中國文化具有較深的素養，加上語言文字的便利及具有對（中共）鬥爭數十年的豐富經驗，對中共整個發展道路的認識較為清楚，故能作出較為準確的預測」<sup>①</sup>。中方學者的研究，累積了有關中共之寶貴資料與知識。這些研究幫助我們認明事件，找到關鍵性的人事時地物。同時，許多學者透過創意性思考，提出重要概念與概念間相互的聯結，解釋事件的本末，成為所有其他研究的基礎。

傳統歷史制度研究所提供的解釋，通常較以默示的方式表現，往往將邏輯過程隱含在豐富的文字敘述當中，它提供了讀者閱讀時的趣味性，也允許讀者依據自己對於文字的理解乃至於對理論的想像空間作出自己的結論。亦正因如此，這方面研究所能顧及的範圍較為寬廣，然而當爭論出現時卻不容易將爭論的焦點集中，而較易出現語意學上的爭辯。

另外有些學者將中共政策研究視為較廣泛的政策科學研究的一部分，這些學者或用演繹推理，或用歸納之系統研究方法，成為近來研究中共的新興潮流，引起廣泛的注意與討論。許多學者都對於西方的形式符號模型（formal model）是否能用於中國政治之研究，抱持著懷疑態度<sup>②</sup>。由於此類型模式至目前為止大部分由西方學者所建立<sup>③</sup>。論者認為此類模型失之簡

① 吳安家，「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方法」，中共史學新探（台北：幼獅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九月），頁三八四—三八五。

② 同前註，頁四〇六。Chalmers Johnson, "What's Wrong With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Asian Survey* (Calif.), Vol. XXII, No. 10, Oct. 1982.

③ 近年亦有多位中國學者在此方面研究成績斐然，例如牛銘實、包宗和、林澤民、黃紀、謝復生……等。

單，未必能深切掌握中國政治的複雜性，由於文化之隔閡，此類型模式無法深入中共決策者心靈深處，了解中共決策的心理過程及老謀深算。因此，對此種研究方法提出了許多合理的質疑。

事實上，形式模型最大功能乃在於將一般思辯之邏輯過程加以符號形式化，一方面使思辯過程中所受到的語意學干擾降到最低，使邏輯過程中可能的謬誤顯而易見，另一方面則使得理論借助於形式符號邏輯（例如數學）的現有成就，來拓展理論的範疇。這些推論過程可以為任何有意檢驗其有效性者所重複，而且不受作者本人信仰價值的影響。作者本人信仰價值的重要性及影響力只會在研究題目的選取，以及理論實際運用的選擇上呈現。所有的假設都明示於讀者面前，以開放的態度面對嚴格的檢視與批判。若讀者不同意該理論，自然較容易確實指出不同假設之出發點可能導致之不同結論，並與原理論相互印證，如此一來，才不會使得研究討論才會進行於兩條並不相交的平行線上，永遠在各說各話<sup>④</sup>。

因此，本篇討論引言擬從「理性抉擇」途徑以符號邏輯形式應用於兩岸關係研究上所受到的幾個誤解談起，進而說明它和其他途徑之間的關係，最後以一個例子來探討其在兩岸關係研究應用上的一些可能性及限制。

## 二、理性抉擇途徑適用於兩岸關係的一些思辯

### (一)中共領導人對於兩岸關係（尤其是台獨問題）的思考有其非理性的一面，不可能用符號語言表示

許多人對於理性的定義有很深的誤解，理性抉擇途徑中的理性二字，其實只在強調決策者行為的「目的性」，至於其「目的內容」為何則在所不同。是故，當一個久病厭世之人去找一位醫生用最沒有痛苦的方式結束其殘生，即為一理性抉擇。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領導人對於兩岸關係的思考是理性的。兩岸分隔四十多年來雖相互有軍事衝突，但中共一直沒有「不理性」到不計一切代價來滿足其民族主義目標。近年來幾次涉外軍事行動，也都經過事先詳細估算，最後衝突也都適可而止。因此其決策乃根據其本身設定之目標而來當挑戰超強可以完成某一重要政策目標時，它可以挑戰超強（例如韓戰及珍寶島事件）。當有更重要目標存在時，它也可以容忍弱國的挑釁（例如菲律賓之於南沙群島）。若中共領導人對於兩岸關係的思  
~~~~~

④ 實際上，此種研究推論方式已為研究美國政治之學者所廣為接受並使用例如 D. Black,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K. Sheps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quilibrium in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 *ASPA* No. 23, 1979; pp. 27-57, and more。許多這方面的研究證明這種研究方法對於吾人解釋、預測，甚至於控制美國民主政治中政治現象有相當的幫助。

考是不理性的，則目前絕大部分的分析都無法幫助我們說明、解釋、預測乃至影響其決策（或許只有「推背圖」以及類似分析除外）。至於理性抉擇途徑使用符號邏輯的傾向，乃企圖透過邏輯關係的符號，使理論辯論脫離語意學陷阱，其算式只是相關變數之間關係的整體說明，並不表示決策者決策時腦海中有類似算式。

## （二）兩岸決策者的情報條件無法達到理性思考所要求

理性思考所需之情報條件可能是理性抉擇途徑受到誤解最嚴重的地方之一。很多人認為理性抉擇需要決策者收集與了解決策時的一切可能選項及其可能後果的情報，之後依成本效益之計算挑出最佳選項。既然少有決策者在決策時能擁有所此種資訊，因而理性抉擇僅為空中樓閣，殊難實現。

## （三）研究者無法進入決策者主觀内心世界深處

此點的確為理性抉擇途徑所面對的重大困難之一。同時，提供此方面問題的解決也不是此途徑的目的或長處。不過這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途徑都必須面對的困難。理性抉擇途徑必須得到長期研究兩岸關係個案、法制與歷史學者的協助，提供此方面資訊，否則難以運用在兩岸關係研究上。而理性抉擇途徑則提供了法制、個案、歷史學者另一套系統檢視運用資訊的路子。由於該途徑強調推理過程的明示化，往往可發現推論過程中不易顯現出的邏輯弱點，並可辨視某些因主觀認知對客觀資訊所造成的扭曲。

## （四）理性抉擇途徑與其他途徑之關係

由上述可知，理性抉擇途徑與其他研究方法之間有分工與互補之效。其關係可以由圖一作一簡單說明：

圖中不同分工階段是以不斷循環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現象理論之建立，通常要先有人對於該現象作長期的觀察作出個案、比較個案等研究，找出可能相關變數，建立概念。後者可依這些成果設定與其所欲探討問題之範圍，並將其中概念符號化，進而依符號邏輯加以演繹建立理論。理論結果或符合原先直觀觀察期望，也可能出乎意料之外。後者通常有其特殊意義，對理論的向前推進能作出重大貢獻。回過頭來，理論的向前推進則可能提供了傳統研究學者重新檢討政治現象的新面向。同時，檢討的結果則可對這些理論的實證適用性作出檢驗，去蕪存菁。

接下來筆者續以利益團體期望值型模討論中共安全決策（Bueno de Mesquita 1981, Wu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4），以及由博奕理論討論兩岸關係中的「延伸阻遏」（extended deterrence）問題為例，並以假設性案例分析，試圖就兩岸關係

### 三、利益團體型模

利益團體型模始於幾個基本假設 (Bueno de Mesquita, 1981, 1986, 1994)。其一，此型模假設集體抉擇乃不同的利益團體間集體談判協商運作所形成的集體政策抉擇。所謂利益團體，(一)乃指一人以上所組成的群體（包括一人在內）；(二)此團體中之成員<sup>⑤</sup>在吾人所定義的單一政策空間中有共同的理想點 (ideal point)；(三)此團體中成員擁有共同籌措之資源；並且四成員願意使用該資源到某種程度去追求共同之理想或利益。集體談判協商及運作過程，可以正式而明顯的方法進行，亦可能透過非正式而隱密的過程為之。是故，他可以指涉民主國家中議會的正式投票，亦可指涉集權國家政治局中權力槓桿的過程。

其二，利益團體型模假設每一團體對於空間中的其他各點之喜好乃隨該點與其理想點之間的距離遞減。換句話說，若該團體必須在任何兩政策點之間做一選擇，該團體會在無其他因素影響下，會選擇兩點中距離理想點較近的那一點。舉例說明，如果某立法院中的次級團體，所期望的證交稅是零，那麼該團體必須在百分之〇·五和百分之〇·七之證交稅間做一抉擇時，該團體會選擇支持百分之〇·五的議案。基於這幾個簡單的假設，已有許多學者推論出若干政治現象中的重要原理。例如白來克 (Black) 的中數原理，等於以嚴謹的推理形式，證明中國自古所傳的所謂「中庸易勝」的道理<sup>⑥</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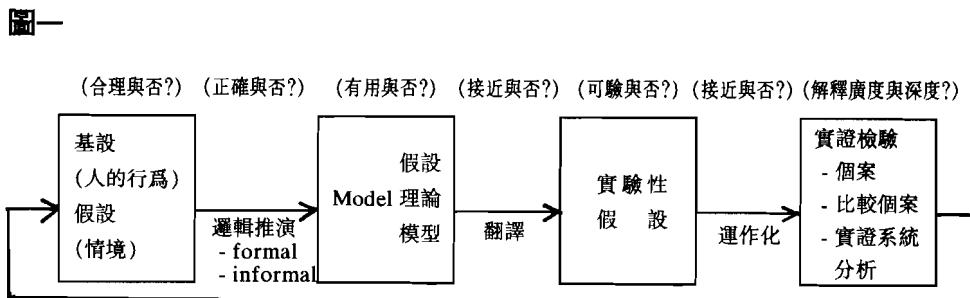
首先我們假設在相關的政策面向（一個或多於一個）上，有N個利益團體並圖透過各種可能之方式，使其理想點在相關的社會中得以實現。因此， $N = \{1, 2, 3, \dots, n\}$  利益團

~~~~~

⑤ 在多數的政策辯論都涉及一個以上的面向，為了要能分析多個面向之相互之影響，吾人必須由

各個單一面向的分析開始著手。先了解各個面向中的問題，在將各個面向聯繫起來做一整體分析。

⑥ Black, *op.cit.*



檢討基設及假設合理性

體的定義如前所述，他們可能是一個政黨，政黨中的一個派系、官僚體系中的一部份人……等。

其次，我們假設相關的政策面向所構成的歐基理得空間  $M$  包含有  $m$  個相關政策面向，因此， $M = \{a, b, c, \dots, m\}$ ，同時我們以  $R_a$  來代表面向  $a$ 。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們將此面向的兩個極端界定為 0 及 100，並假定期間為 0 到 100 的所有實數所形成的有界（bounded）連續數線集合。舉例說明，在證交稅應如何繳收的問題言，其兩個極端可以是：(1) 0，代表完全不繳收；及 (2) 100，代表一切交易所得利潤歸公。如此一來，吾人可將任何一個相關團體在此政策面向的主張，轉化成此數線上的一個點。

就任何相關利益團體  $i$  ( $i \in n$ ) 而言，其都在上述政策面向上的各種可能方案有一定的好惡（preference），如前所述，吾人假定各利益團體有其在政策面向上的理想點，而其他可能方案中，越接近其理想點者，會越可能得到該團體的支持。如果吾人以  $X_{ia}$  ( $X_{ia} \in R_a; 0 \leq X_{ia} \leq 100$ ) 作為理想點之代號，那麼就任何其他團體  $k$  所提出之方案  $X_k$  言， $i$  對於  $X_k$  效用的評價  $U_i^k(X_k)$ ，則為該政策方案在政策面向上與團體  $i$  之理想點間距離的漸減函數（decreasing function），使得  $U_i^k(X_k) = f_i(X_k - X_i)$ 。每一團體在此政策面向之其他方案相對於其理想點距離之效用之漸減速率可能不同。一般而言其遞減速率取決於該團體對於風險的態度，又稱之為「風險係數」。有的團體較不願意冒著被排除在最終方案的勝利聯盟（winning coalition）之外的風險，如是一來其在政策方案上的妥協性也就增高了，而其效用隨距離遞減的速率也就較緩和。反過來說，若某團體相當堅持己見，而在乎是否會因此被排除在勝利聯盟之外，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那麼他所願冒的風險自然大些，其效用函數隨距離遞減的速率也就較為陡峻。為了說明的方便，吾人暫時假定所有團體之效用函數之形式都相同，而如上述之等式。

就任何一利益團體言，除了上述之「（利益）理想點」以及「風險係數」之外，各個團體之權力（power）以及相關政策面向對於各團體的顯要性（salience）亦是利益團體型模中所使用的重要概念。任何一個團體必要有能力對於相關政策之決策有影響力，方能成為此型模中就該政策問題之相關團體。換句話說，如果有團體對於相關政策完全沒有外顯或潛在的影響力，那麼縱使該政策對於該團體有重大影響力，該團體亦不應納入計算。就任一團體  $i$  言，吾人用  $C_{ia}$  (the capability of  $i$ ) 來代表  $i$  在相關政策面向  $a$  決策（外顯或潛在）影響力總和中所佔有的比例。 $\sum C_{ia} = 1$ 。如果在政策面向  $a$  上所有的團體都願支持某一特殊方案，那麼只要這些團體決定支持該方案，這個方案成為該社會之政策抉擇的機率就等於 1。每一個團體對於不同政策面向間對於自己的顯要性可能不盡相同，這種顯要性的選舉自然會影響該團體對於其資源運用上的抉擇，既然每一團體都只有有限的資源，任一團體只有將最多的資源放在對自己最重要的政策面向上。在此吾人可以用  $S_{ia}$  來代表團體  $i$  對於政策面向  $a$  顯要性的評價。 $0 \leq S_{ia} \leq 1$ 。至此，任何一個在政策面向上的利益團體都可以為  $U_i^k(X_k)$ ， $C_i$  以及  $S_i$  所

標示這三個變數值所標示<sup>⑦</sup>。

在相同的政策方案相互競爭的過程中，各個利益團體會選擇與自己理想點最接近的方案支持之，不過，爲了求取勝利，有時利益團體必須與其他團體妥協結合成聯盟，共同推動某一妥協後同意的方案。任何一聯盟方案的興起，都可能刺激其他非聯盟中團體以另一替代方案結合更多力量，對原方案形成挑戰，最後何方案能成爲集體抉擇，取決於該方案是否能集結足夠的政治支持力。

利益團體分析型模之發展，以可就各個團體在某一政策面向的相互談判結果作出分析，以了解在該單一面向上最後可能出現的政策抉擇。尤有甚者，吾人可以將兩個以上不同政策面向之間的相互妥協的可能性亦納入考慮，使型模更接近真實世界中政策談判的複雜性。

最近在美國由此型模對鄧死後中國大陸局勢的分析指出，鄧長期在中共派系利益團體間擔任槓桿與指標的角色，其死後所可能引發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很可能比一般想像來得更劇烈，吾人對大陸局勢未來的穩定性不能太過樂觀。此外，民間及地方利益團體的影響力亦已具關鍵性，值得吾人注意。

#### 四、博奕理論（Game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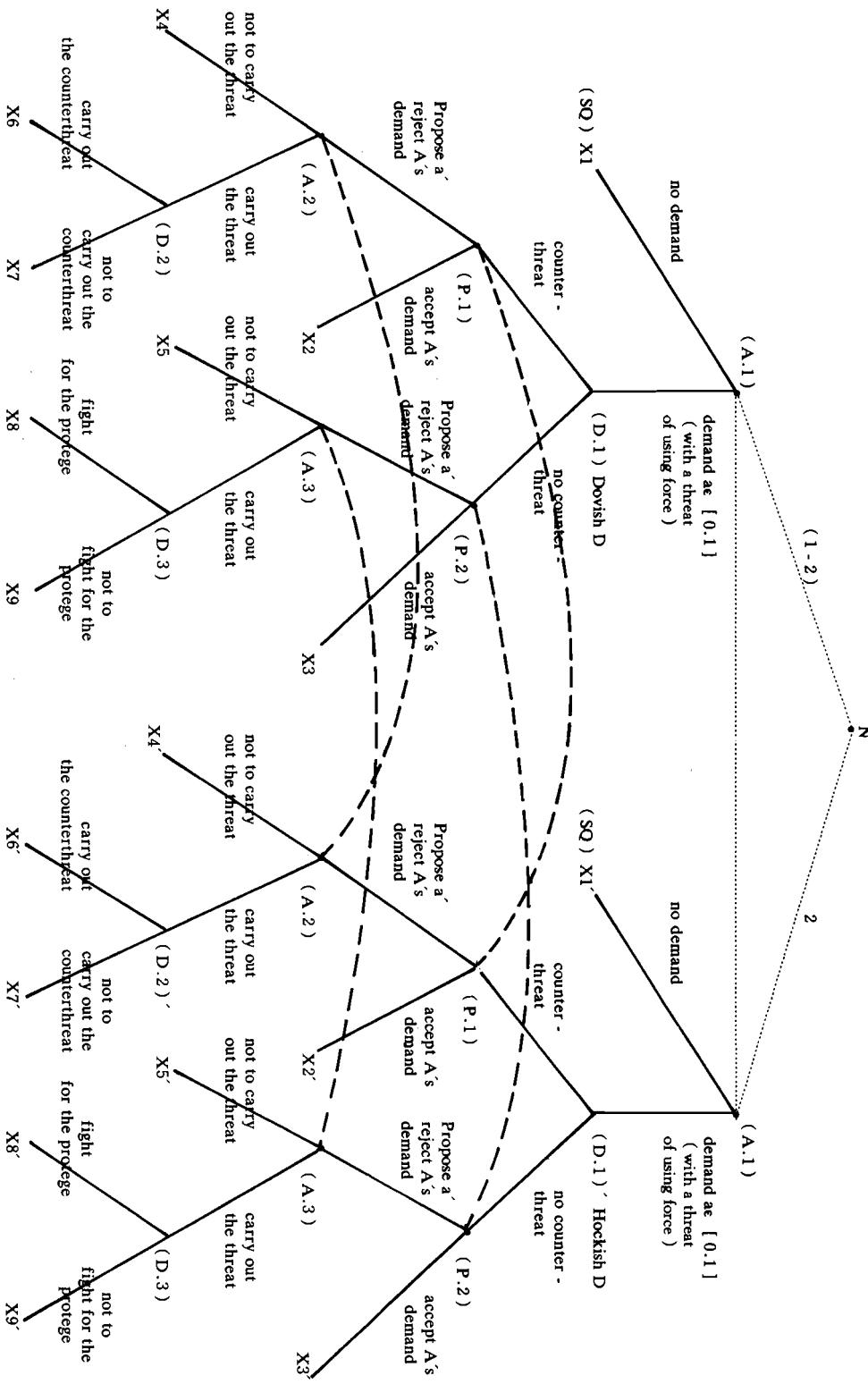
由博奕理論來探討兩岸互動關係亦在近年受到國內學界的重視，並已成績斐然（牛銘實，一九九四；包宗和，一九八八；楊海華，一九九〇……等）。此處僅以筆者思考延伸阻遏所建立的三方變局模式爲例。說明博奕理論對於兩岸關係之思考的一些可能幫助。

如衆所知，「美國態度」一直是研究兩岸關係學者們所關心的課題之一。由於兩岸軍力的不對等，美國提供台灣的保護對台灣安全一直有特殊意義。尤有進者，議者在討論台灣獨立問題時亦常將美國的可能反應視爲重要變項之一。台灣、美國與中共之間在這方面的關係或可用圖二表示之。

當兩岸關係有了新情況（在此假設台灣愈來愈走向台獨之路），中共（A）就必須面對「提出警告」要求與否的抉擇。如果中共選擇了「不行動」，則此新情況可持續下去。同時不會在兩岸關係中造成危機。反之，如果中共提出了警告及要求「a」，則會引起三方面的緊張局面。

⑦ 為解說之方便，吾人暫將 $C_{ik}$  及 $S_{ik}$  中的 $k$ 去掉，以茲簡化。

圖二



此時，美國（作為台灣的保護者-D-）可以選擇是否回應中共提出警告。接著台灣（P）應有機會根據其對中共及美國先前行為的觀察決定是否接受中共的要求（例如取消獨立）。如果台灣堅持，則中共將面臨是否用兵，如果中共決定用兵則美國將要面臨是否出兵支援台灣的選擇。

筆者根據此架構的初步分析顯示：如果情報周全，而軍事衝突的結果顯而易見（perfect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 with sequential moves and outcomes certainty），則其結果若非中共接受現狀（outcome X1），否則即為台灣在中共的要求下，因得不到美國的支援而屈服於中共的要求之下（outcome X2）。

不過，如果美國的干涉能為中共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果，則只要中共對美國決策者特質有些許的不確定（ $\alpha \neq 0$ 但值很小），就可對中共產生相當大的阻遏力量。此外，由此架構亦可了解若美國真保護台灣，其與說是由美軍直接介入還不如由美國提供台灣先進武器，而由台灣自己防衛自己。在某些特定狀況下，美國的保護對台灣安全可產生反效果。亦即，美國愈想保護台灣，中共用兵台灣的動機愈強。

## 五、小 結

一般而言，用理性抉擇途徑來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往往會碰到下列幾個問題。其一，理性抉擇形式邏輯的理論推演對於概念及模型範圍的界定要求甚嚴，因此使得其探討問題範圍大為縮小。其二，形式邏輯的理論推演大量使用符號的結果，使得其中學者與途徑外學者之間的溝通格外困難。其三，理性抉擇學者必須留意在應用其理論的過程犯了「過度引申」的毛病。

無論如何，由文中兩例的討論可見理性抉擇途徑並非不可能適用於兩岸關係的實用分析上，應是值得吾人注意的思考方式之一。

\*

\*

\*

## 評論人：楊開煌（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在台灣的中共研究界雖然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已經有過研究方法的論戰和反省，但是十餘年來在這一行的研究方法的討論，並未能形成風氣，這一方面的專論很少，專注的學者也不多，吳秀光博士的論文選擇此一題目來討論，無疑是令人激賞和鼓舞的。我們樂見在這一行中有更多的類似產品可以促使「中共研究」的學術化的進程。

其次在吳博士的論文在前言的部分點出傳統研究的優劣之處，以便導出「模型研究」的需要，從研究方法來看，如果吳博士的目的在於擴大範疇和精確問題，我想大家都可同意，但如果是取代的話，則恐怕就只能有精確化的功能，而不可能有擴大化的功能。

其三吳博士選擇「理性抉擇」途徑，無疑是研究兩岸關係一個可行的途徑，然而第二頁至第三頁部分有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某人選擇結束生命，某一政權選擇武力來解決衝突等在常人來看是不理性，但是吳君認為「理性抉擇」是討論目的，而非「目的內容」，這裡顯然存在認知的落差，因為常人所討論是目的理性，而吳君所辯護的是工具理性的問題，如果我們承認「生命」是人類共有的價值——最終目的，則一切反生命均不理性，而吳君所談的例子暗示了「痛苦的解脫」、「領土完整」和「主權維護」才是目的，從而使後者的選擇獲得「工具理性」的位階，而當我們使用「工具理性」的概念來理解政權行為時，我們必然是使用「相對主義理性觀」，而非「絕對主義理性觀」來看，因此，吳君在文中的第三頁所談的資料多少和決策者内心世界的問題才會成為「理性抉擇」研究的難題，因為在工具理性的情況，判別理性與否的基礎在於研究者與行為者的情境越一致越有可能對理性與否作出主觀的判定。

其四有關「利益團體」的研究途徑，其實與過去的派系鬥爭的研究十分相似的，在派系鬥爭中吾人主要是追尋「人際關係」網絡的分布作為分化派系的主要途徑，而「利益團體」則比較偏重現實利益的分布，其中差異其實都是東、西文化間深層的差異，人際關係一旦建成是很難打破，而利益取向的團體則很容易重組，在中國因為「利益」而壞「人際」的人是很難存在，因此純粹利益取向的研究是很難掌握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本質和動態，另外利益團體在鬥爭中會選擇與自己理想最近的方案加以支持，而「人際關係」的團體常常為了人情、報恩等等非理性的因素不選擇最接近自己理想的方案，這些都是使用「利益團體」研究時很難關照的重點。因此在「鄧後」的內部權力鬥爭中應該以傳統的「派系鬥爭」和「利益團體」兩者並用的方式，應當比單獨一種研究方式，更容易評估「鄧後」的去向。

至於博奕理論研究的部分本人比較同意吳博士的分析，總之，吳博士這一篇以研究方法為討論主題的大作，是十分重要而精彩的論文，我們希望在台灣的中共研究界能不斷就研究方法的問題提出新的嘗試，以便台灣成為國際上研究中共問題的最重要的地方。

## 評論人：包宗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後鄧時期非常可能步入集體領導的時代，中共領導班子將很難再出現像毛、鄧這樣具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以大陸當前改革開放的程度來看，後鄧時期的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是很難再走回頭路了。只要大陸繼續改革開放政策，則兩岸間即有經貿方面之重大共同利益存在，中共就必須維持雙方間一定程度的緩和，以確保經貿交流的良好環境。至少強硬派在集體領導架構及改革開放政策下是很難取得絕對的主導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後鄧時期的中共領導人物由於不具鄧小平的領導威望，將無形中降低其對中共軍方的約束力。由於中國大陸仍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故上述個人因素的轉變仍對後鄧權力分配及軍方影響力的升降無可避免地造成影響。而軍方一貫主張對台強硬，且因長期封閉，政策考量較少從區域或全球宏觀角度來衡量，較易有非理性的舉動發生。此對兩岸關係所可能投下的負面影響是相當值得注意的。

鄧去世後，中共長征一代的領導人物已凋零殆盡，新一代的執政者雖仍擺脫不了共產主義教條的框框，但無論從歷史淵源或感情上而言，均較少國共間恩恩怨怨的情結存在。換言之，意識形態在決策考量上應會漸趨淡化，利益取向將相對上升，這對兩岸關係進一步緩和應有正面程度的作用。

令人略感憂慮的是後鄧時代因缺乏像鄧小平一樣一言九鼎的人物，故對鄧小平所遺留下來的政策在相當時日內恐不易變更。換言之，中共對台政策可能會「蕭規曹隨」一段時間，直到內外環境有進一步變化時方有調整的可能。後鄧時期中共領導班子的組成結構也將關係到鄧之對台政策會忠實履行至何種程度以及會持續到多久。

後鄧的大陸局面也不能完全排除亂的可能，一旦此種情況發生，中共對台政策可能產生兩種變化。一種情況是因自顧不暇，而對台採取更具彈性的態度。另一種可能是藉著在台海引發事端以激發大陸民族主義情緒，來凝聚內部共識，間接解決內部政治問題。這就有類於西方所謂的「代罪羔羊論」（seapengoat theory）。當然，台灣方面是否授予對方借題發揮的機會，也對對方傾向採取何種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總的來說，鄧去世對兩岸關係各有其正負面之影響。短程而言，中共對台政策不易產生結構性的轉變，但就長程來看，對台政策應會更朝務實的方向發展。而在轉型階段，台灣方面應特別留意中共軍方影響力的升降及集體領導者對台政策的異同，並避免有刺激中共借用民族主義情緒肇生台海事端的機會，以有利於其對台作法朝更務實的方向過渡。

## 討論：

張鎮邦：中共只有在台灣宣布獨立時，才會用民族主義作號召，進行武力犯台；其它的狀況都不足以動員中國大陸的力量進行武力犯台。因此我們必須和中共談判，以和平統一為基本政策。

蔡 璋：中共內政不穩時，對台的恫嚇增加，實際干預卻少，而當中共內政較穩時，倒常提出對台新政策，如一九五四、一九七二年，而且相當理性。因此在中共政權不穩時，不要刺激中共，多談判，促進瞭解。

董瑞麒：談判也具有危險性，如果老是談不出具體成果，台灣老百姓對兩岸的政府失望，助長台獨，以及要國民黨下台。

葉明德：中共對台政策決策過程中，經貿部門和軍事部門之間是否有較明顯的差異，決策時以何方較具影響力？

宋國誠：集體領導的模式是較溫和，七個人一起發瘋贊成對台動武，要比一個人發瘋發動對台動武的可能性要低。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經過許多人的解釋，已形成一套穩定的政策，江澤民等人都是一個政策解釋者和執行者，「鄧後」這個對台政策仍舊會持續下來，不會做自我否定。中共對台政策決策相關部門有七、八個，其中外交、軍事、中台辦較強硬且一貫，而國台辦、經貿部門、宣傳部以及民間的台聯組織則傾向務實、溫和。鄧小平在時，種種不同的意見，在內部討論時，尚能調處，不致於分歧，不會造成對外的不一致，「鄧後」中共內部對台政策是否會有更大的分歧，主要來自內部派系衝突、利益衝突。

## 邵主任總結：

我們的大陸政策必須加以檢討。十多年來，中共要的「三通」大致都已到手，而我們所要的「國際生存空間」、「不武力犯台」、「承認我們為政治實體」則沒有一個到手。最近政府提出經貿為主軸的兩岸關係，兩岸在經貿議題上順利進展，但在其它方面沒有突破，例如新聞交流、學術交流、學者之間的交換研究等等。我們可以向中共提出大規模的學術交流、學者交換，以及和平服務團、農村建設團等提議。